

序

馬克思主義與當代

目 錄

○	佩里·安德森：《序》	1
一	官僚政治的根源	7
二	當代馬克思主義	35
三	暴力與非暴力	53
四	論社會主義社會的人	63
□	註釋	83

序

佩里·安德森

1984·8

收集在這裏的最後一組文章和其他的文章性質不同①。在這些從六十年代就開始發表的文章裏面，羅伊徹（Deutscher）提出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任何社會主義者都面對了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四個問題——如何用歷史的眼光來考察到今天為止一切落後國家每一場革命後都必然產生出來的官僚政治（Bureaucracy）？古典的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先進國家時，其適用性如何？在超越資本主義，通往社會主義的過渡中，暴力的角色為何？塑造出來的社會主義文明，具有什麼樣的形式？

羅伊徹在〈官僚政治的根源〉中，探討第一個問題。人們常常說，他在有關赫魯雪夫（khrushchev）時代蘇聯政治發展的著作中，對於蘇聯與一般蘇聯集團國家的民主化前景太過樂觀；因為看到蘇聯整個社會結構有了廣泛的變化，他確認六十年代早期變革的失敗不會拖太久。他沒有辦法活著看到，並且仔細分析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ism）的持久性穩定過程。但是，在他對整個官僚政治的歷史現象所作的最具理論性的反思（reflections）中，他對於蘇聯之類的社會在短期內發生變動的可能性，只有很小很小的信心，中國就更不用提了。因為他在一個精心構思的冗長說明中，把官僚政治的社會根源，定位在腦力工作和體力勞動的分離，這些根源，附隨著階級社會本身第一個胚胎的出現，「在原始公社部落和文明社會交會的時期，就已埋在地下」。在描繪官僚管理的變形，

以及它和從法老 (pharaohs)^②到波旁王朝 (Bourbons)^③之間接連而來的各種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以後，羅伊徹接著辯稱：在資本主義中，「官僚政治的政治權力，永遠和構成資產階級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成熟度、活力以及自治能力成反比。而另一方面，當階級鬥爭在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一種像是僵持的狀態時，當互相鬥爭的階級經歷一連串令人精疲力竭的社會和政治鬥爭之後，似乎已經屈從地躺下時，政治領導大致已經自動地傳到官僚政治的手中。」維多利亞 (Victoria)^④的英國和傑克遜 (Jackson)^⑤的美國，擁有自信滿滿的資產階級，它們之所以在十九世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最少官僚主義，其原因在此；而 1848 年以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互相耗盡精力」，則導至法國第二帝國^⑥的興起；而德國容克 (Junkers)^⑦、企業家和工人之間的「多面僵持」，則產生了俾斯麥 (Bismarck) 官員的獨裁。把這個邏輯顛倒過來，應用在資產階級本身已被毀滅，而工人仍然四分五裂且虛弱無力的社會，我們可以看出，正是這個邏輯解釋了為什麼在周圍帝國主義嚴酷敵視的背景下，後革命官僚政治會取得權力及生命方面之巨大成長的原因。然而，這些後資本主義官僚政治，儘管擁有專橫的傲慢和特權，並沒有構成一個新階級。羅伊徹觀察到：到今天為止，「蘇聯的官僚還沒有辦法使自己取得它的社會和心理認同，而這些認同乃是構成一個新階級的要素。它有點像一只巨大的變形蟲，把自己覆蓋在後革命社會上。因為它沒有自己的脊椎骨，它只能是一只變形蟲；它不是一個已經成形的獨立單元，它並不像法國革命後老資產階級作為一股歷史勢力那樣地出現在舞台上。」它馴服於自己的矛盾，因此不會永存下去。在一個具有普遍自動化、短工時、文明的休閒以及文化的獨立等等特徵的社會中，「腦力工作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抗，才會真正地消亡，組織著和被

組織者之間的分裂，也才會有同樣的結果。」他預言：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才能看出：官僚政治過去是階級社會的不明顯序幕，將來則標誌著階級社會的既激烈、又殘忍的收場白——僅僅是收場白罷了。」

屬於這一組的其餘三篇文章，都是羅伊徹實際參與左派政治的產品。那時，西方年輕一代曾經引發一場半革命傾向的羣衆運動，其中興起過對美國打越戰的廣泛反對，並啓始了校園的反叛。這些演講顯示，他緊緊抓住當代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問題，它們同時也說明，儘管羅伊徹有著本世紀的主要革命經驗，把他「僅僅」當作歷史學家是何等地錯誤，因為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歷史地思維，他還發展並防衛他獨創的道德和哲學立場。（當代馬克思主義）在《資本論》問世一世紀以後，把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情況當作社會解放（emancipation）的理論來考究：他把一種遠異於流行口號的典型的辯證方式判斷，認為它「既在興旺上升，也同時在敗壞衰落」。對於「馬克思主義是否過時？」這個問題，羅伊徹答道「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之批判的精髓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它非常簡單，而且非常明白，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秩序的所有多面分析，全都集中在這一點。它是：在生產過程越來越多的社會化和資產階級財產的反社會化之間，存在著引人注目的矛盾。老式的自由生產者不再像前資本主義那樣一代傳一代，大家互相獨立地生產；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整體的生產方式，已經越來越社會化。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單元、每一個部份、每一個小小的零件，都和所有其他的互相依賴。整個生產過程變成單一的生產的社會過程——而且不只是一個國家範圍的生產過程，它是一個國際的生產過程。而同時，你們却有一個反社會化的財產，私有財產。財產的反社會化和我們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資本

主義一切無政治主義及非理性化的泉源。」

這個矛盾終究是和解不了的——「衝突必將來臨」。那個衝突的性質無法細節地加以預言，但是它的一般形態可就沒有什麼值得質疑的地方了。一方面，羅伊徹在甘迺迪——詹森景氣期（boom）的高峯時，表示他對任何「西方資本主義進一步順利演化發展」的不信任：在二十年的繁榮以後，蕭條（Slump）會再發生——而果然發生了。另一方面，西方的階級鬥爭，必須被看作是「為期多個世代的反資戰爭」。而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以所有不同的形式——從法西斯主義到最細緻的社會民主的改良主義——動員起來，要來維護既存的社會秩序。」然後，羅伊徹用令人震驚的語句繼續寫道：「除了像巴黎公社^⑧那種特殊時期以外，勞動階級動員的激烈和強度，遠比不上支配及統治階級在幾乎永久性地位上所保持的動員。即使在公社時期，起義也從來未真正動員成生死鬥爭——我們可以从一些描述看出他們的輕浮，他們高興而且和善的樂觀主義。」

正是抱持著這種樂觀主義的力量和弱點，羅伊徹在〈暴力與非暴力〉一文中作了評論；這是他最尖銳，最令人不安的著作之一。在這裏，他以強調馬克思主義古典觀點中如下的傳統緊張關係作為開始：作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之手段的政治暴力，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免於暴力的無階級社會之目標間的緊張關係。然而，那個重要的、可辯護的辯證法，在俄國革命的悲劇性變化中被擊敗，「在極度不人道的壓力下」，恐怖發生了，而且，「使得一個杯子大小的暴力變成滿滿幾桶，甚至匯聚成河流」，因此，「最後，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非暴力意義受制於大量壓倒性的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然而，兩者不可能乾乾淨淨地加以分割。羅伊徹說：因為「和斯大林主義劃清界線，並說我們對斯大林主義無需

負責，說那不是我們的目標，這樣做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是一種缺乏道德勇氣的表现」。——「我們不能從我們的紀錄中把斯大林主義取消掉，雖然我們無須對斯大林主義者的罪行負責。」爲什麼可以這麼說呢？羅伊徹用一種少見的個人供認繼續說道：

「我們（當我說「我們」時，是指我個人精神上所認同的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我是指列寧（Lenin）、托洛斯基（Trotsky）^⑨、布哈林（Bukharin）^⑩、季諾維也夫（Zinoviev）^⑪。以及早期歐洲的共產主義領導者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了這個對於暴力的頌揚，因爲我們把它當作自衛的技巧。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⑫在批評這種態度的最早的怯懦跡象時，她便已了解這一點。」

然而，這是自我批評，而不是否認。革命暴力儘管令人感到遺憾，也不見得有什麼榮耀，但在對抗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敵人時，它仍然是必要的，在以敵人之干涉爲內容的殘忍的越戰中，這一點得到了說明。但是，在像美國這樣先進的工業化社會中，階級勢力的潛在性平衡，會使革命鬥爭產生遠比在落後、孤立的俄國來得有利的、不被扭曲的結果。在那裏，如果被剝削的絕大多數已經準備要動武來打破剝削者的勢力，而不把它當作可有可無，只是爲了好心才去做的事情，那時所需用到的暴力可能是「合理的，微小的」。

在本書最後一篇文章〈論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一文中，羅伊徹展望將來，並且質問：在不淪落空想、猜測的情況下，在一旦已經最後達成的無產階級社會中，人類的潛在力和有限性可能如何？（「人」[man]這個字的意思不要弄錯；羅伊徹曾經提到「女人和小孩對父親[羅伊徹不是用 man！——譯者按]的依賴關係」，可見，它是性中立的，正如俄語中的 *chelovek*，或德語中的

Mensch。) 他的回答突出了兩點。第一點是他的投射的節制；社會主義不會「解決人類的全部困境」——事實上，在托洛斯基的三個一組 (trinity) 的「飢餓、性及死亡」中，它只能給其中的第一個提供救濟。在階級之外——對不起，雪萊 (Shelley) ——人類仍然要承擔罪行及痛苦，並對施加於各種本能驅策力 (drives) 之上的文明的限制感到不舒適。但是，這些驅策力可能不會有佛洛伊德 (Freud) 施加給它們的歷史不變性和社會重要性。羅伊徹儘管對於心理分析在其適當而受到限制的範圍內的根據加以尊重，他仍不難處置它對解釋歷史的誇張的要求，對於政治的入侵更不用提了。因為他在討論佛洛伊德有關侵略性 (aggression) 的理論時，不加渲染地指出：「人在整個歷史當中，畢竟已經把自己組成軍隊，為財物或財產的要求而互相屠殺，然而，除了在神話裏面，他們到今天為止，並沒有為了「性關係方面特權」從事過戰爭。」而此時，馬克思主義已經試圖「從正確的地方下手解決我們社會所面對的任務」，並且已經移動了好幾座山——或者成功，或者失敗——在這麼做的時候，心理分析的實際社會效應相對比較起來，一點也不顯得重要。像當前這種階段，不加鑒別的心理分析崇拜，之所以往往出以最誇張理想的形式，和它從歷史唯物主義撤退出來息息相關，羅伊徹對於真理和力量之間的真正關係所做的冷靜提醒，是再有益不過了。就他的展望來說，社會主義既不會給人類的奴役狀態，提供完全的解放，也不會停留在想像出來的一切人類本性的不變性面前。

(1987.5.22.譯；1987.6.5.校)

① 官僚政治的 根源

1960年初，伊薩克·羅伊徹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一場研究院討論會（graduate seminar）中，以官僚主義為題作了三場演講。《官僚主義的根源》是這三次演講內容的縮節版，最先發表在1969年秋季號的《加拿大斯拉夫研究》（Canadian Slavic Studies）中。

—

不管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政治結構的地方，我們現在正親眼目睹當代社會日益明顯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傾向。西方的理論家向我們保證說：官僚化的動力很大，因此，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管理體制（managerial system）內，它已靜悄悄地來臨並取代了資本主義社會。而另一方面，在蘇聯集團的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t）社會，尤其是在蘇聯本身，官僚政治（bureaucracy）有了驚人的長足成長。「管理的社會」（managerial society）是一個流行但是却大致沒有意義的陳腔濫調；我們有理由在此描繪一個比它更有內容、更令人滿意的官僚政治理論。然而，要開始勉力對付官僚政治問題，可不是一件簡易的工作；雖然它展現於人們眼前的強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大有改變，官僚政治本質上和文明一樣地古老。

我要討論官僚政治的根源，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必須深究下去，以便找出最根本的原因——起始原因——從而探討人類文明的這個惡魔何以能成長得這麼驚人。在這個和國家問題大致平行的官僚政治問題中，人們集中注意人與社會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現在，人們把這一點時髦地稱作「異化」（alienation）。

官僚政治這個字本身就暗示著「辦公署」（bureau）、機關以及某種具有敵意的非人的統治，它擺出具有生命的架式來統治人類。照一般的說法，我們也指無生命的官僚，和組成那種機構的人員。管理（administer）國家的人看起來好像並沒有生命，好像只是機器裏面的一顆齒輪輪牙。換句話說，我們在這裏以最精簡、最

密集的方式面對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具體化（reification），以及機器與事物的生命現象。這一點當然會立即令人聯想到拜物教（fetishism）的大情結（complex）：在漫天遍野的經濟市場中，人似乎處在事物、商品、甚或貨幣的掌握之中。人的關係和社會關係客體化（objectified），而客體的事物（objects）則似乎僭取了活元素（living element）的力量和權力。人從國家和國家的代表——官僚政治——異化出來，人也從他自己的經濟產品異化出來；這兩種異化很類似，它們也相似地互相聯繫著。

要超越表面進入核心來看清下列關係是不容易的，這些關係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管理社羣生活的機器和社羣本身之間的關係。困難在於：現象（appearance）不僅僅是現象，它也是實在（reality）的一部份。國家拜物教^⑬和商品拜物教可以說是已經「嵌入」（built into）國家和市場作用於其中的那部機器裏面了。社會既與國家疏遠（estranged），可是同時又解脫不開。國家既是壓迫社會的惡魔，又是保護社會之不可或缺的天使。

在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中，有一些最隱秘、最複雜的方面也清楚而且驚人地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用語中。我們爲了分別出統治人們的官僚而說「他們」——徵稅的「他們」、發動戰爭的「他們」、以及做各種和所有人類生命有關之事情的「他們」——當我們這麼說時，只是表達一種重視的感覺，表達一種和國家疏遠的感覺：但是，我們仍然意識到，沒有國家就沒有社會生活，沒有社會發展、沒有歷史。把現象篩離現實的困難在於：官僚政治執行著社會生活所顯然必需且不可或缺的一些特定功能；然而，它也執行另一些在理論上看來是不必要的多餘的功能。

官僚政治的這些矛盾，當然會在哲學、歷史學、以及社會學上面，導致對於這個問題的兩種互相矛盾且極端對立的觀點。撇開諸

多介於中間的細微差別不談，研究官僚政治和國家問題，傳統上大概有兩種基本途徑：官僚政治方法和無政府主義方法。韋伯夫婦（Webbs）^⑭ 喜歡把人區分成兩類：一種是從官僚政治的觀點來評估政治問題的人，另一種人則採取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這當然是簡化的提法；但是，不管如何，它却有它值得一提的地方。官僚政治方法這一邊已經有它偉大的哲學家、偉大的先知、以及著名的社會學家。從哲學上替國家作辯護的最偉大的辯護士大概是黑格爾（Hegel），而從社會學上替國家作辯護的最偉大的辯護士則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⑮。

舊普魯士無疑地是國家的樂園，因此，最偉大的國家和官僚政治的辯護士來自普魯士，當然也就不是偶然的事了。黑格爾和韋伯的理論思維方式不同，層次各異，事實上他們都是普魯士官僚政治的形而上學家（metaphysicians），他們概括了普魯士的官僚政治經驗，並進而把它投射入（project）世界歷史的舞台。因此，我們有需要把這個思想學派的基本教義銘記於心。對黑格爾來說，國家和官僚政治都是精神概念本身（the moral idea）的反映（reflection）和實在，也就是至高理性（supreme reason）的反映和實在，（Weltgeist）的實在，以及上帝在歷史中的表現（manifestation）。馬克思·韋伯在某一點上是黑格爾的後代，黑格爾的孫子（大概是個矮孫子），他把同樣的概念放進典型的普魯士官僚政治美德清單之中：

精確，快速，不含糊，精通檔案，持久，謹慎，團結，絕對服從，減少摩擦，以及減少物質及人員費用——在嚴格的官僚管理中，尤其是在它的一人獨裁制下，所有這些都要提昇到最優點，……官僚政治也接受 *sine ira ac studio* 的原則。^⑯

大概只有在普魯士，人們才會寫出這樣的字眼。當然，這個美德清

單可以很容易地被另一個類似的惡行清單所抵消。但是，對我來說，馬克思·韋伯目前已經成爲衆多西方社會學知識的燈塔，實在更加令人驚訝，令人心感不安。（在一次辯論中，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教授對我的最大責備乃是：我在寫作和發言時，「好像馬克思·韋伯不存在」似地。）我樂於承認：或許沒有任何別人比韋伯對官僚政治的細節作過更深的研究；他把它的發展的諸多特色加以分類，但是沒有了解它的全部意義。我們全都知道那個老德意志所謂的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⑰，它能夠大量地生產包括官僚政治這種工業成品在內的任何特別的工業產品，但就是看不出官僚政治的發展主流。

在另一個極端，則有對於官僚政治和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包括最有名的代表——蒲魯東（Proudhon）^⑱、巴枯寧（Bakunin）^⑲、及克魯泡特金（Kropotkin）^⑳——以及派生出來的自由主義和無政府自由主義傾向（anarcho-liberal friends）。只要細心考察，你們就會看出：這個學派代表舊法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國農民（muzhiks）反對官僚政治的智識反叛。這個思想學派當然專門編排官僚政治的惡行清單。國家和官僚政治被當作歷史的永遠篡位者；它們被當作人類的一切惡魔的化身，而這些惡魔，不取消國家，不破壞一切官僚政治就無法加以消滅。克魯泡特金爲顯示法國革命道德墮落之深，描寫了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㉑、丹東（Danton）^㉒、以及雅各賓派（Jacobians）和阿貝爾派（Hébertists）^㉓如何從革命家轉變成政客。在他的眼中，敗壞革命的乃是官僚政治和國家。

事實上，所有這些方法都包含部份真理，因爲在實踐當中，國家和官僚政治曾經是人類文明的雙面人（Jekyll and Hyde）。它們事實上確實比其他機構更集中、更有力地描繪了人類的德行和惡

行，以及它的歷史發展。國家和官僚政治把焦點對準它們自己，而表現出人類文明的二重性特徵：到今天為止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都伴隨著倒退；人們所做出的每一個進步，都用倒退作代價去購得；人類創造能力的每一次開展，都以其他方面的創造能力的殘廢或不良發育來支付。我認為，在一切形式的社會及政治的政權中，這種兩重性在官僚政治的發展中一向顯得十分引人注目。

官僚政治的根源確實和人類的文明一樣古老，或者甚至可能更古老，因為它們在原始公社部落和文明社會交會的時期，就已埋藏在地下。正是在那裏，我們找到當代大量而精緻的官僚機器的最早，但却仍然非常出色的祖先。在原始社羣分解成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組織者和被組織者，分解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那一刻，它們就顯身了。當部落或氏族開始知道勞動分工會加強人類對自然的力量，並提昇滿足自己之需要的能力時，人類便看到官僚政治的第一棵幼芽，這棵幼芽成爲階級社會的真正的最早跡象。

勞動分工隨著生產的過程而發生，而與此同時出現的還有第一個依功能劃分的等級制度（*hierarchy of functions*）。正是在這裏，我們第一次瞥見了那個即將分開腦力工作和體力勞動的文明的鴻溝。畜養牛羣的第一個原始過程的組織者，可能是中國官員、埃及僧侶、或當代資本主義官僚的祖先。腦力和體力的初步分工跟著帶來多種更細的分類：農業和漁業之間，或貿易、工藝和航海之間。在歷史發展的基本過程之中，接著而來的是社會的劃分成爲階級。從文明的開端到我們自己的時代，社會的基本區分，在管理者與工人之間，遠不如在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來得那麼厲害；後者的區分或者被自己所內化（*absorbed into itself*），或者掩蓋過前者。在多數的時期，管理附屬於有產者，附屬於有產者階級。

人們可以廣泛地把官僚政治和基本的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依

不同的類型作出分類。第一類可以叫做埃及——中國式；其次是羅馬——拜占庭式，包括它所派生的羅馬教會中的教士等級制；然後就是西歐資本主義式的官僚政治；第四類是後資本主義式。在前三種類型中，尤其是在封建制和奴隸制社會中，管理者完全附屬於有產者，這種附屬的程度非常嚴重，以致於在雅典、羅馬和埃及，官僚通常都在奴隸當中去徵求。在雅典，最早的警察人員就是從奴隸當中徵求來的，因為人們認為剝奪其他自由人的自由，有失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尊嚴。多麼好的本能啊！正是奴隸才適於充當官僚，因為官僚乃是有產者階級的奴隸：從這裏你們可以看到官僚依賴有產者的那種幾乎可以說是樸素得驚人的現象。

在封建制度中，官僚多多少少有點黯然失色，因為管理者或者直接來自封建階級，或者被它所同化（*absorbed into it*）。可以說，社會等級制已經「嵌入」封建制度裏面，因此，無需一個特殊的等級機器來管理公眾事務並懲戒無產者大眾。

後來，很久以後的後來，官僚政治取得一個遠為令人尊重的地位，而它的代理人也就變成有產者的「自由的」、領薪過活的人。然後，它就假裝上升到有產者階級之上，甚至一切社會階級之上。而且，官僚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的範圍內，確實取得了那種優越的地位。

國家機器和其他階級的大分離當然來自資本主義，此時，清楚標明著的等級制以及人對人的依賴等等封建社會的特徵，已經不再存在。「人人平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假設（*fiction*），使得成立一個權力機器，一個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度組織起來的國家來運作，變成一件十足重要的事。如同市場中存在著經濟勢力的等級制度一樣地，充當政治等級制的官僚，也就必須注意使社會不致於像官僚政治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平等。那裏存在著

階層、利益，以及管理級別的等級制度，使得平等的虛構（fiction）永存，同時却加強不平等。

在這個階段，官僚政治具有什麼特徵呢？首先是等級的結構；其次是它所擁有的權力機器那種看來似乎是自給自足的性質。有人對我們說，我們社會生活的極廣範圍，極大規模、以及極端複雜，使得社會管理越來越困難；只有那些掌握管理秘密的熟練的專家，才有能力執行組織的功能。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並沒有從埃及僧侶的年代走開太遠，這些僧侶保住那些帶給他權力並且使社會相信只有受神感召的他才有能力管理人間事務的種種秘密。妄自尊大的官僚，講著在很大程度上用來象徵其社會聲望的神秘行動（lingo），畢竟和帶著魔法秘密的埃及僧侶相去不遠。（順便提一提，這難道不也和帶著迷信秘密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很相近嗎？）

在深為官僚政治的深奧智慧所著迷的馬克思·韋伯的好幾十年以前，恩格斯已經用更加現實和客觀的眼光來觀察事物！

國家絕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毋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②⑤

我們可以再附加一句，即使是福利國家，它畢竟也只能是一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恩格斯更進一步說：「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於社會之上。」②⑥ 他如此描述國家從原始共同體浮現出來的過程：

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也不能使他們〔官吏〕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於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別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②7}

然而，無需對官僚政治發怒；它的力量僅僅是社會弱點的一種反映，這個弱點就是絕對多數的體力工人和很少數專精於腦力工作者的分離。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民族可以把自己從智識貧乏（intellectual pauperism）當中解放出來，其根源在於官僚政治。在這些根源上面又長出其它的真菌（fungi），但是，這些根源本身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福利資本主義社會中仍然存留下去，即便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們也殘留著。

一

我要更嚴格地重新來界定我這次要討論的主題。我對官僚政治的一般歷史並無興趣，我也不想描述歷史上一切找得到的官僚政治的種類和樣式。我的主題集中在這一點：在歷史上使得官僚政治對社會取得政治優勢，那些因素應負責任？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次成功的革命可以打破並摧毀官僚勢力？不管革命的性質如何，也不管革命前的舊秩序為何，在緊接著每一場革命以後的一個時期，都有一個國家機器像火鳳凰那樣在灰燼當中復活起來。

我已經用過份加強語氣的方式交代有利於官僚政治的長期性因素，就是：腦力工作和體力勞動的分工，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間的鴻溝。事實上，這個矛盾乃是階級社會的序幕；但是，在進一步的社會發展中，那個序幕越來越被下列的更基本的分離所淹沒：奴隸

主和奴隸的分離，農奴主和農奴的分離，以及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分離。

官僚政治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才作為一個獨特的個別社會集團取得真正的大規模優勢，而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則有種種原因：經濟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有利於現代官僚政治擴展出去的是：市場經濟、金融政治、以及使資本主義本身成為產品的持續而且深化的勞動分工。只要國家的僕人還只是稅款包收人、封建地主、或者封建地主的助理，則官僚還不成其為官僚。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甚或十八世紀的收稅人，只不過像是一個承包商；要不然，他就是封建地主的僕人，或者它的部份扈從。只有在金融經濟擴展並普及後，國家的每一個僱員的薪水都用貨幣來支付，官僚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獨特的集團。

官僚政治的成長還被下列因素所進一步激化：封建本位排他主義（particularisms）的瓦解，和市場在國家範圍（national scale）的形成。只有在國家市場的基礎上，國家官僚才能以它的面貌出現。通過造成官僚成長的一般性經濟原因本身，只能解釋當代形成的官僚政治如何成為可能，還不能解釋它如何成長，以及它為什麼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會取得它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要解答這個問題時，人們不應該在經濟變遷方面尋找答案，而應該在社會—政治結構中尋找答案。譬如說，我們看得到這種令人驚訝的事實：作為古典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少官僚主義（bureaucracy），而一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年代還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德國，却最多官僚主義。居於中間地位的法國，就官僚政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強度來說，也居於中間地位。

如果人們想要找出幾條有關資本主義社會中官僚主義影響之與

衰的一般規律，人們會發現：資本主義中官僚政治的政治權力，永遠和構成既定的資產階級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成熟度、活力，以及自治能力成反比。而另一方面，當階級鬥爭在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一種像是僵持（deadlock）的狀態時，當相互鬥爭的階級經歷系列的令人精疲力竭的社會和政治鬥爭之後，似乎已經屈從地躺下時，政治領導大致已經自動地傳到官僚政治的手中，在這些情況下，官僚不只是把自己建成一個規範國家運作方式的機器，而且成爲一個把政治意願強加給社會的勢力。當代官僚政治的搖籃當然是前資產階級（pre-bourgeois）的君主專制政體（absolute monarchy）——英國的都鐸王朝（the Tudors）、法國的波旁王朝（the Bourbons）、或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the Hohenzollerns）——這種在衰落中的封建主義與上昇中的資本主義之間保持一個不確定平衡的君主政體。封建主義已經弱得無法維持其優越性，而資本主義也還太弱而不能樹立它的支配地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可以說是存在著階級鬥爭的停滯（stasis），從而使得君主專制政體有了活動的空間，可以在這兩個對抗的階級之間充當仲裁人（umpire）。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勢力之間的對抗越強烈，兩者之間的僵持越麻痺，君主專制政體的官僚，就有越多的機會去扮演公斷人（arbiter）的角色。順便在此一提，英國（同時還有美國）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最少官僚主義，正是由於在歷史的早期，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抗已經因爲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勢力的逐漸合併而解決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顯要和英國的大貴族家庭承擔了在（歐洲）大陸由官僚行使的功能。在某種意義上，處於資產階級地位的封建成份，在沒有形成一個獨特而且分離的社會集團的情況下管理國家。美國在她的歷史中也很早就免除了那種促成官僚政治成長的因素：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之間的那

種鬥爭。

俄國是一個相當不同而且奇特的個案，在那裏，國家和官僚的巨大權力由於所有兩個社會階層的來發展而形成：不管是封建成分還是資產階級成份，都沒有强大到足以管理國家事務。正是國家，它像創世者（*demiurge*）²⁸那樣創造了社會階級，現在，它正導致階級的形成和擴張，它正在妨礙並挫敗它們。它的官僚就如此這般地不只變成一切階級的仲裁人，也同時變成它們的操縱者（*manipulator*）。

如果我要給我的進一步詳論訂一個小標題，那麼它大概會是一個非常一般性的小標題：《論官僚與革命》。在這裏，我想要澄清一些混淆不清的東西，而且我害怕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得不抵觸幾個已被確認的歷史學派。既然已是無可避免的事，我將用最挑釁的形式來提出問題：英國清教徒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嗎？法國大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性質嗎？起義軍的領頭人物沒有一個是銀行家、商人、或船東。無套褲漢（*sans-culottes*）²⁹、老百姓、貧民、以及下下中產階級（*the lower-lower middle classes*）站在戰鬥的最前線。他們成就了什麼呢？在「紳士農民」（英國）以及律師、醫生、和報界人士（法國）的領導下，他們取消了君主專制政體和它的朝臣官僚（*courtier bureaucracy*），並且掃除了阻礙資產階級財產關係發展的封建機構。資產階級已經强大到足以充份意識到自己追求政治自決的權力。它不再接受君主專制政體的監護和獨裁；它自己要去統治社會。在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被老百姓大眾驅趕前進——革命一旦完成，資產階級就企圖自己統治整個社會。

革命的過程，包含著它的所有吶喊和對抗，包含著權力在革命陣營中從較保守的派別到較激進的派別，甚至到空想的派別之間的

經常性轉移——所有這些因素導致剛剛跑到前頭的諸階級之間的新的政治僵局：老百姓大眾、無套褲漢和都市貧民都已疲乏、厭倦；而打了勝仗，目前充當支配階級的資產階級，則又因革命鬥爭導致內部分歧、分裂及精疲力盡，而不能統治社會。因此，在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中，我們看到一個具有某種不同性質的新官僚浮現出來：我們看到軍事獨裁制，它外表上幾乎像是前革命君主專制政體的延續，或者它的一個更壞的版本。前革命政權有它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國家官僚。革命的要求是這個機器的分權化。然而，中央集權並不是出於統治者的壞動機，而是反映了經濟的演化，它要求一個國家市場，而這個「國家土壤」可以說是滋養了資產階級，然後輪到資產階級來製造革命。革命的結果帶來另一個中央集權制。在克倫威爾（Cromwell）時如此，在拿破崙（Napoleon）時也是如此。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的過程以及新官僚的興起，非常令人吃驚，以致於（例如）托克威爾（Tocqueville）^⑩就把它當作至多和前革命傳統之延續一樣的東西。他辯解道：法國革命所已經做到的，只是把前革命政權的工作進一步做下去而已，而如果沒有發生過革命，這個趨勢也會同樣走下去。^⑪這是那些把眼光僅僅固定於〔歷史〕發展的政治方面，而完全忽略它的社會背景和更深的社會動機的人所作的辯解；他只看到社會的外表，而未看到它的組織構造（texture）或風格（colour）。

革命後，政治的中央集權和以前一樣地延續下去，然而，官僚政治的性質却已整個地徹底改變了。法國現在有了從社會上不同階層召募來的資產階級官僚，他們代替了前革命政權的朝臣官僚。在拿破崙統治下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官僚，使得王政復辟（the Restoration）^⑫殘存下去，而最後則找出市民國王（Citizen King）^⑬作為它適當的頭子。

在下一個階段中，我們看到官僚主義的再度興起，以及國家中央集權趨勢的更進一步擴展；這個階段再度發生在所有社會階級政治麻痺的時候。在 1848 年，我們看到不同階級勢力又一次對抗的情況；此時，已經被確立的資產階級勢力對抗著新生的無產階級勢力。到今日為止，沒有人把這個互相耗盡精力的過程描寫得比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來得好，尤其在他那本《路易·波拿巴^④的霧月十八日》中。他也明示了所有社會階級的屈從是如何保證了官僚，或不如說是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的軍事武力的勝利。這時，這種情況不只是法國，也是德國，尤其是普魯士的特徵；在這裏，僵持是多方面的：在封建勢力和容克的半封建勢力之間，在資產階級和新的工人階級之間。而且，它在普魯士還導致俾斯麥官僚主義的統治和獨裁。（順便在此一提，雖然在外表上，俾斯麥當然少有或根本沒有波拿巴的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俾斯麥政府描寫成一個「波拿巴主義」政權。）

三

我完全了解，由於這個題目的寬宏，我只能提綱挈領地指出必須進一步加以細訴的重點。我不會論及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關係。雖然這一點尤其在英國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根據我的觀點，它殊少理論上的趣味。根據我的想法，它乃是「資本主義與官僚主義」這個大題目中的一部份。不管企業當中的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國家化了，經濟中的大部份仍然屬於資本主義，而在這裏，量也決定了質。社會生活的整個背景是資本主義，而一般的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精神，則滲透到包括國家化企業在內的一切企

業之中。我們聽到不少關於「鐵路上的官僚主義」或「煤礦內的官僚主義」之類的抱怨。在最近的一次罷工裏面，電視報導過幾個鐵路職工，他們說，「事情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了」：在鐵路國家化以前，他們和僱主之間可以維持較多的個人關係，而現在，這個企業已經變得如此匿名（anonymous），使得工人和這個龐大的全國性企業之間，不再具有個人聯繫。這種「個人聯繫」當然只是工人想像中的虛構物。火車司機和五大鐵路公司之任何一個老板間，有什麼樣的「個人聯繫」呢？然而，鐵路職工真正相信他在南方、中部或西方鐵路公司（Southern or Midland or Western Railway）時，他不只是一個齒輪；從政治上來講，這毋寧是一件重要的事實。現在，他從他必須去配合的巨大實體（vast entity），從他必須去為它工作的巨大實體「異化」出來。而這個「異化」，不管走到那裏，都是一切種類的官僚主義既成機構的共同問題，不管它們更寬宏的社會架構如何；我將成為最後一個否認資本主義官僚主義和後資本主義制度官僚主義之間存在著一定共同特徵的人。

現在我要觸及一些與某種官僚主義有關的特殊問題，這種官僚主義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後的全面性國家化企業中，以及在一個至少一開始時，就任何意義而言都稱得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之下，浮現出來的。這個問題很明顯地影響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它事關緊要；而我也相當確信它將在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當中得到正當性。

當我仔細查看討論官僚主義的一些古典馬克思主義著作時，我對馬克思主義者如此相對樂觀地——人們可以說成是輕率地——處理這個問題感到震驚。舉個實例吧：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⑤一度自問：社會主義社會會不會被官僚主義的一切惡魔所威脅。在《基督教的基礎》中，他討論基督教會從被壓迫者

的信仰轉變成一個巨大帝國的官僚主義機器的過程。在一個靠奴工過活的社會背景下，這種轉變當然是可能發生的。古代的奴隸沒有任何活潑生動的階級意識，容易變成官僚主義的奴隸。考茨基堅稱：但是這個當代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熟到足以推翻資本主義，它不會允許一個官僚主義爬到它的背脊上。這不只是考茨基的個人判斷，而考茨基乃是從恩格斯去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超過二十年期間內，馬克思主義最權威的發言人，他也被視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接班人。恩格斯本人在他的不同著作中，尤其在《反杜林論》中，便持有一種事先就把社會主義中產生官僚主義的可能性加以排除的看法：「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轉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對立。」³⁶

先前的各種社會都需要作為剝削階級之組織的國家，來作為壓制奴隸、農奴或領薪工人等等被剝削階級的手段。在社會主義中，當國家變成社會整體的真正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東西了。而且，隨著當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隨著產品的豐富及超豐富，不再需要使人們和工人處於被統治的地位。

我認為，正是考茨基使用了一個非常淺白，非常生動的隱喻：警察可以用警棍來指揮交通或者分散罷工者或失業者的示威。就在這麼一個句子當中，他已經把管理事物和管理人民之間的傳統區別總結出來。如果你們假設社會中已經沒有階級的霸權，官僚的角色就被減少到對於事物，對於客觀社會和生產過程的管理。我們並不在意於取消一切管理功能——這在工業方面已發達的社會中將會是荒唐的——但是，我們在意於把警察手中的警棍的功能減少到它適當的角色，譬如解決交通擁擠。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他們對於將來可能

興起的官僚主義的威脅，似乎只有一半的認識，但是，他們花很大的功夫來強調公社為保證社會革命不使官僚權力再生所作的措施。他們強調指出，公社已經採取很多可供將來社會主義改造作為典型和模範的預防措施：它在普選中產生，並且設立了被選舉出來的文職人員（civil service），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選民的要求之下隨時被罷免。公社取消常備軍，並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它也設立了公務員（civil servant）不能領取比一般工人多的薪水的原則。這應該已經取消了官僚集團的一切特權。換句話說，公社樹立了一個在國家一旦成立時就會開始消亡的（wither away）典例。列寧在十月革命僅僅幾週前，還特別努力要恢復馬克思有關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官僚主義的這部份當時幾乎已經被忘光了的教訓；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用一個有名的警句來表達他對國家的概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甚或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管理應該變成簡單的事務，從而讓每一個廚師都有能力管理國家事務。

按照最近數十年來的所有痛苦經驗，很容易便可以看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實際上已經極端地低估官僚主義的問題。我想，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有兩點。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原始創建者們，並不真想事先描繪社會主義革命後湧現出來的社會。可以說，他們抽象地分析革命；就像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是分析任何特定的資本主義體制，而是分析抽象的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本身那樣，他們也對社會主義社會或後資本主義社會作抽象的思維。他們的分析是在採取實際行動的好幾十年以前所作的，如果把這一點考慮在內，人們就會認為他們的方法可說是具有科學上的合理性（scientifically justified）的。另外一個是心理方面的理由。他們不得不以發生在1848年，他們親身經歷過的偉大革命經驗作為典型來看將來的革命。1848年的革命至少曾經多多少少地同時擴及

整個歐洲，他們將之視為革命的連鎖反應。（這裏是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這個概念的萌芽，從這一點看來，不斷革命並不是托洛茨基（Trotsky）所首創的；它實際上已經深深地嵌入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之中。）一個全然屬於歐洲的（all-European）社會主義革命，在它剛剛取得勝利之後，將有相對的較大保障。既然很少有社會緊張關係，那就很不可能有國內鬥爭；既然沒有干涉戰爭，那就不需要再建常備軍，而這些乃是官僚主義化的重要因素。他們也假設，至少在高度工業化社會的西歐，工人階級中的一個相當可觀的部份會給革命政府提供強力的大眾支援。他們也相信，一旦歐洲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已經贏得革命，它仍然會對革命保持信心和忠誠。這一點再加上既存的民主傳統，將為反對官僚機器的復活或者新的官僚機器的形成，提供最強力的保證。

當我們企圖要指責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低估官僚主義在後革命社會的危險性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們把物質富饒的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先決條件和存在理由，當作首要條件。「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份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出現了，……確實是出現了。」^⑳」恩格斯於大約九十年前^㉑在他的《反杜林論》中這樣加強語氣地說道。事實上，一直到本世紀的中葉，我們才在生產極端不足而相當不可能有像樣的物質生活的國家當中，看到社會主義革命。

無疑地，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有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根據一個深刻而且現實的歷史分析，深信只要國家還沒有被取消，一切革命都將遭受挫敗——這種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相同；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深信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個為它自己的目的服務的國家，以便粉碎、破壞舊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創建它自己的國家

機器來這作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那個機器有史以來第一次不代表特權少數的利益，而代表勤苦大眾——社會財富的真正生產者。「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對於生產資料的佔有——「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³⁹ 從那時起，國家對社會關係的干涉，就變成是多餘的事情了。對人的統治被對事物的管理所取代。國家的政治功能消失；剩下來的只是對於生產過程的指揮。國家不可能像無政府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在一夜之間取消掉；它將慢慢地「消亡」。

俄國革命的現實，在任何個別的方面，都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假設相反。它不是抽象的革命——它是頂真實的！它並不跟隨1848年的典型，它不是整個歐洲的劇變；它孤孤單單地保留在一個國家裏面。它發生在一個無產階級佔極少數，而這少數集團在世界大戰、革命和內戰當中又經歷了階級解體的國家裏面。它又是一個極度落後、貧窮不堪的國家，在那裏，革命政府立即面對的問題，不是建造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創建任何現代化文明生活所由生的第一批先決條件。所有這些至少產生了兩種政治發展，而無可避免地導致官僚主義的再生。

我已經描述過官僚主義的政治霸權如何地總是跟隨在階級鬥爭的僵持狀況，以及所有社會階級由於政治和社會鬥爭的過程而精疲力盡之後。現在，我們來作細節上的必要修正。在俄國革命之後，我們再一次看到同樣的情況：在1920年代的早期幾年當中，俄國社會包括工人、農民、資產階級、地主和貴族在內的一切階級，在政治上、道德上以及智識上，若不是已經被摧毀，就是全然精疲力盡。經過充滿著世界大戰、革命、內戰以及工業破壞的十年磨難之後，沒有一個社會階級有能力堅持己見。剩下來的只有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⁴⁰ 機器，它就在整個社會之上建立了官僚

主義霸權。然而，*cela change et ce n'est plus la même chose*：整個社會已經經歷了根本性的變遷。有產者和無產者大眾之間的古老分裂，導致另一種性質，但不見得更無害，更無腐蝕性的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分。這個區分在以前似乎是被階級差別和階級傾軋所淹沒了的；在革命後，它却取得遠比以前巨大得多的力量。而再度領先的乃是長期的、最古老的、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間的分裂。階級社會的序幕現在一變而成爲收場白。和「消亡」很不相襯地，後革命的國家（*post-revolutionary state*）把一向來未曾擁有過的權力集中在她的手中。官僚主義史無前例地似乎變成既全能、又無所不在了。如果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我們知道官僚的勢力必然會在有產者階級的勢力中找到平衡力（*counterweight*）；但是在這裏，我們看不到這種約束和限制。官僚現在是整個國家資源的管理者；以前，它顯得更加獨立、更加分離、而且確實被擺在社會之上。與消亡大異其趣地，國家採取了一種對所有社會階級施予官僚暴力且幾乎永遠恣縱（*orgy*）的形式，從而達到它的頂峯。

現在，我們稍爲回舊馬克思主義對革命的抽象分析，來看看後革命的俄國的情景，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和這個分析互相矛盾。如果俄國革命是歐洲式的，而無產階級大眾在革命中取得迅速的決定性勝利，而且它的國家沒有發生戰爭和國內鬥爭所引起的一切政治社會的混亂和屠殺，我們很可能不會看到俄國國家激起恐懼感的高峯。然而，這個問題仍然會遠超過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想像而存在著。一句話：十九世界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似乎傾向於把將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定階段重疊（*telescope*）起來。古典馬克思主義所「重疊」的，可以說是「革命——然後——社會主義」；然而，在革命和社會主義之間却註定存在著一個很漫長、很

複雜的過渡時期。既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一個時期也將以官僚和工人之間的無可避免的緊張關係作為特徵。然而，在馬克思主義中已經可以找到有關那個緊張關係的預測。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談到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④ 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它還流行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附帶著它的不平等和個人收入的巨大差別。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顯然地仍然需要促使它的生產力充分發展，直到一個真正富有及豐盛的經濟被創造出來；可見，這時的社會需要獎賞技術並提供利潤刺激。官僚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熟練工人，因此，他無疑地會把自己放在社會等級之中具有特權的那一邊。

正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從私有變成公有，管理國家經濟的責任落到組織者的肩上，因此，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間的區分取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重要性。新社會還沒有在自己的基礎上得到發展，但是，它正從資本主義空中湧現出來，而且仍然帶有資本主義的一切胎記。要各取所需，它在經濟上、道德上和智識上都還不夠成熟；而只要每一個人都還按勞取酬，官僚便仍然是有特權的集團。不管蘇聯領導人當前使用著什麼樣的假馬克思主義術語，今日的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仍然離得很遠——它只不過是已經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道路上剛剛踏出第一步而已。

官僚和工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根植於腦力工作和體力勞動的分裂。今日蘇聯社會可以由任何廚師來管理（雖然各種廚師都試圖要這麼做）的說法，偏偏就是不符事實。實踐證明無法建立並維持巴黎公社所宣稱的原則，而這個原則被馬克思主義用來保證不使官僚興起，並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又被列寧所讚美。根據這個原則，官員的薪水不能多於一般工人的工資。這個原則隱含著一個真正的平均

主義的社會——而這正是馬克思及其信徒在思想上的重要矛盾的部份。顯然地，不管公務員的功能多高都不能領取比一般工人工資來得多的薪水的說法，和在社會主義的低級階段因為仍然有著「資產階級法權」印記、期待「分配平等」是空想的說法，不可能調和。在後革命的俄國國家，既然有它的貧困和生產力的未成熟發展，對於報酬的你爭我奪，註定是激烈而且殘忍的；加以，因為資本主義是在渴望平均主義的鼓舞之下被取消的，不平等乃顯得更加令人厭惡、更加令人震驚。它也是如深淵一樣低水平的生存上面的不平等，或者毋寧是生存水平線下的不平等。

馬克思主義中有關國家消亡的部份理論，是基於它的中央集權組織（centralist organization）和分權的普遍性單元（the universal element of decentralization）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應該是一個具有經由選舉產生出來的公社、地方市議員、地方政府和自治的國家；然而，它們形成一個統一的機構而需要一個合理的國家化的生產方式。這個觀點也以社會的高度發展為前提，而這一點，俄國在本世紀之初並不具備。

在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工人和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可以證明具有一些重要的創造性成分（creative elements）。工人和官僚同樣需要趨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只要工人大眾仍然是好幾個世紀的壓制和無知所遺留下來的知識貧乏階級；生產過程和管理就必將落在公務員的肩上。從另一方面來說，在一個真正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構成基本的社會階級，社會主義是工人而不是官僚的事。官員和工人之間的動態平衡，可以在國家的權威和大眾對國家的控制中找到對應物（counterpart）。這也將給中央集權原則和分權原則之間的必要平衡提供保證。我們在俄國所看到的是一個全然的不平衡。客觀歷史的環境和主觀的不同利益，使得這個平衡

大大地、決定性地偏向官僚主義那邊。我們在 1956 年的匈牙利和波蘭所看到的，是對於這個——斯大林主義——事態的反動，那時，平衡從原來的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工人則對官僚主義從事熱情、暴亂，而且盲動的反叛，這個反叛無疑地可以從他們的經驗和悲慘得到辯護，但是，它結果也導致嚴重而且危險的不平衡。

那麼，我如何看待工人和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前景呢？我如何看待它的進一步發展呢？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於官僚主義的看法中有關歷史展望的一切錯誤。然而，我認為這種觀點和我所碰到的一切其他觀點相比，大大有助於處理官僚主義問題。

我們必須質疑的問題是：我所描述的那個頂峯發生在革命之後的官僚主義，會不會持續演變而形成一個新階段？它會不會使它自己永遠成為特權的少數？它會不會使社會不平等永存？我首先要指出一個非常明顯、重要、但却常常被遺忘的事實：今日存在於俄國的工人和官僚之間的一切不平等，是消費上的不平等。這一點無疑地非常重要、非常氣人、非常令人悲痛；然而，官僚雖然擁有他所粗暴、頑固地加以護衛的一切特權，他仍缺乏擁有生產資料的這個主要特權。官員仍然控制著社會，並且對它稱王稱霸，然而，它缺乏內聚力和團結一致性，而不能形成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分離的階段。官僚們享受權力和某種範圍的繁榮，然而，他們無法把他們的繁榮和財富傳給他們的孩子。他們無法累積資本，也不能為後代的利益而投資；他們不能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屬朋友永遠當官僚。

不錯，和當代有產階級相比，蘇聯官僚更明顯地、規模更大地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支配社會。然而，它却比較脆弱。它不只是無法使自己永存，甚至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地位及管理持續下去。在斯大林統治下，一個官僚領導集團接著另一個被砍頭，一個

工業管理領導集團接著另一個被整肅。接著而來的赫魯雪夫，分散了官僚政治的最強力中心：首都的一切經濟部長（ministries），都被分散在寬廣的俄國。直到今天，蘇聯的官僚還沒有辦法使自己取得它的社會和心理認同，而這些認同乃是構成一個新階級的要素。它有點像一只巨大的變形蟲，把自己覆蓋在後革命的社會上。因為它沒有自己的脊椎骨，它只能是一只變形蟲；它不是一個已經成形的獨立單元，它並不像法國革命以後老資產階級作為一股歷史勢力那樣地出現在舞台上。

蘇聯的官僚政治還因為具有深刻的固有矛盾而殘缺不全：它的統治是來自工業財產和金融財產的被取消以及舊政權的被打敗；因此，它必須效忠這個勝利；它必須永遠重新認識，它代表國家、代表工人去管理工業和金融。蘇聯的經理儘管擁有特權，必須自我警惕，由於越來越多的工人接受越來越多的教育，經理的技巧、誠實和權限受到嚴密監視的時刻可能很快便會到來。他們依賴工人的冷漠而興起，這些工人到今天為止容許它代表他們自己去管理國家。但是，這是一個不穩定的位置，一個和傳統、財產及法律所神聖化的基礎相比遠少穩定性的基礎。解放官僚權力的源頭和官僚對那個權力的使用之間的衝突，在「我們」工人和「他們」經理及政治的階級制度之間，製造了持續的緊張關係。

不管經理集團變得多麼有特徵，它之缺少穩定性與內聚力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最近十年來，蘇聯的官僚政治一直處於大量擴張的過程中。數以百萬計的人來自工人階級，還有較少部份來自農民，他們被招募來到這個行列。這種持續的擴張也對官僚的結晶成一個階級、甚或一個有疑聚力的社會集團，起着反作用。當然，我也知道一個較低階級的人一旦擠身於特權等級，他自己也就變成官僚。在個別的情況下，在抽象的理論中，這一點可能會如此；但是，就

整體來說，「背叛一個人的階級」並不這麼簡單。當礦工或工人的兒子變成工程師或工廠管理人時，他不可能就從第二天起就發生在他先前的環境以及發生在工人階級中間的事情全然沒有感受。一切調查令人信服地表示，找不到任何其他國家像蘇聯那樣存在著從體力到非體力、到美國人喜稱之為「精英階層」的那麼快速的運動。

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絕大多數官僚的特權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蘇聯行政官員的生活標準和我們的中下階級相當。甚至高高居於金字塔上面的極少數人的奢侈，也並不特別令人羨慕，尤其當我們考慮到他們所冒的危險時——而我們全都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這些危險是多麼地可怕。

當然，即使是小小的特權，也有助於強化工人和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我們不應該把那種緊張關係誤當階級對抗，儘管有我們在細心檢驗後會發現它們僅在表面上有着一些相似性。我們在這裡觀察到的，毋寧是同一階級中不同成員之間的敵對，譬如說，熟練礦工和不熟練礦工之間的敵對，或火車司機和比較沒有技術的鐵路員工之間的敵對。這個敵對和緊張關係本身包含諸多政治對抗，但是，它無法藉社會中任何的動亂來加以解決。它只能依靠成長來解決，這個成長使社會有可能滿足人口中的廣大羣衆維持生活的最低需要，並進一步加以超越。它可以因為教育的普及和改進而得到解決，因為正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和智力財富可以緩和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間的那個古老，而現在重新出現並且尖銳化的分裂。當被組織者不再是不會說話、動作不靈光的無助農民時，當廚師不再是古代供人使喚的廚房幫手時，官僚和工人之間的鴻溝，確實有可能消失。剩下來的便是功能的區分，而不是社會地位的區分。

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消亡」的古老期待，對我們來說似乎有點古怪。但是，我們可別輕忽了老信條，它們只不過是那種今日已

經不爲人們所熟悉的成語的一部份罷了。馬克思真正的意思在於：國家把自己壓制性的政治功能剝奪掉。而我相信，它只可能出現在一個以生產資料國有化爲基礎的社會，免於蕭條（Slump）和景氣（Boom），免於投機和投機者，免於私有經濟反覆無常之市場的不可控制的勢力。在一個科學和工藝的一切奇蹟都已轉變爲和平和生產用途的社會；在一個工作時間短暫而且休閒文明化（而且全然不同於我們荒謬的商業化大眾娛樂！）的社會；同時——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在一個免於個人崇拜、教條主義以及傳統觀念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腦力工作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抗，才會真正地消亡，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間的分裂，也才會有同樣的結果。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才能看出：官僚政治過去是階級社會的不明顯序幕，將來則會標誌着階級社會的既激烈、又殘忍的收場白——僅僅是個收場白。

（1987.5.20 譯；1987.5.30 校）

② 當代馬克思主義

《當代馬克思主義》是羅伊徹於 1965 年 3 月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講稿修訂版。

對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來說，當代是指什麼時代呢？是馬克思主義支配的時代呢？還是馬克思主義衰落的時代呢？在那些馬克思主義被當作主導主義的國家中，官方的答案當然是：這是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處於前所未聞、前所未見、史無前例的欣欣向榮的時代。在西方，尤其在我們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⑫的國家，每天都有人從眾多學術或其它性質的講壇上面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不但衰落了，甚至已經不切題了——它和當代問題無關。我的祖國波蘭那邊傳來一個聰明的年輕哲學家，却又是一位蹩腳的政治分析家的聲音。他告訴我們：討論馬克思主義不再具有任何益處，因為馬克思主義已經深深贏得並征服人心，以致於已經成為當代思潮的有機組成部份，而當它成為人類思想的有機組成部份的時候，這就標誌著一切偉大主義的終結。這個年輕的哲學家在斯大林時代來臨後，居住在華沙，那時，他和他的同代人認同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只知道斯大林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接受被提供的觀點而認為：正式的馬克思主義是斯大林主義，而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而現在，他們想要擺脫斯大林主義，這對他們來說相當於要擺脫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把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同起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又似乎既在興旺上升，也同時在敗壞衰落——這就是當代具有諷刺性質的辯證法。

自從成年以來（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⑬的事了），我就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從來不曾猶豫遲疑——我不說忠誠（allegiance），因為這跟「忠誠」無關——我從來不曾對自己馬克思主義的（*Weltanschauung*）感到猶豫遲疑？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辭彙，我無法思考。即使以死相逼，我也辦不到。我或許可以試看看；但是，我就是辦不到。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我的存在

(existence)的一部份。和那些對馬克思主義抱有這種「忠誠」的人不同地，我倒不想把一個認為馬克思主義正處於黃金時代的概念拋給你們——你們或許都是一些剛剛開始要認識馬克思主義的人。事實和這種說法差得很遠。這是一個正在引發反資，並發展出後資本主義那種社會革命的年代；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才可以說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勝利的時代。但是，它同時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退化以及勞工運動在智識方面衰落的年代。正因為當代勞工運動在馬克思主義以外找不到任何其他有創造性而內容豐富的主義，只要馬克思主義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僵化起來，它的一切智識標準就狠狠地衰落下去。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方面有所擴展，但在它的思想方面反而萎縮、退化。實際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架構互相脫離，而在這個架構內，革命已經依照期待來臨，在這個架構內，革命的正當性已在下列的基礎上得到辯護——在哲學、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如果你要的話，甚至在道德的基礎上。

對於研究思想和主義的哲學學派或歷史學派的學生來說，這種說法一點也不奇怪。一切能夠支配幾個世代的真正偉大的思想學派，幾乎都有它的膨脹、覺醒及發展等等時期，也有它的衰微及沒落等等時期。就這方面來說，我可以馬上想到的唯一的其他思想學派，乃是亞里士多德學派（Aristotelian school），它支配人類的智力幾乎長達二千年。在各種不同時代的諸系列過程中，它經歷過偉大的創造性解說期和創造性影響期，它也經歷過下列幾個時期：它凱旋於對自身的拙劣模仿，它凱旋於中世紀天主教的經院哲學^④，它雖然以亞里士多德哲學為基礎，但它和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關係，就好像歪曲的模仿和該事物的實際圖像之間的關係一樣。這一點並不剝奪亞里士多德哲學甚至存在於中世紀的道理，不剝奪它的創造性方面，也不剝奪在那時還存在而隨後將促成中世紀歐洲經

院哲學之退化的刺激作用。就這一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和亞里士多德哲學可以相提並論，因為，它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已經把資本主義下的世界性社會、經濟，甚至政治經濟集中表現出來，概括起來，同時也揭露出把資本主義引導到後資本主義秩序的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我們已經同意把後資本主義秩序描述為社會主義秩序）。

不管那些流行時髦的人對它作何種想像，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學術、美學或哲學的時髦品。他們在經過一、兩個流行期被它衝昏了頭以後，可能會轉而宣稱它已過時。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從無邊的歷史發展中成長出來的概括；而且，只要我們所活着的歷史時期沒有被我們遠遠地拋在後頭，這個主義在它的細節上或次要點上容或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東西把它的精髓取消過，而且，也沒有任何東西看起來好像會取消它在將來的恰當性、有效性和重要性。但是，我們同時面對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退化。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有所脫節，而且，在我稱之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和庸俗馬克思主義（vulgar Marxism）之間，有著驚人的矛盾，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永遠是一種羞辱的矛盾。（所謂「古典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同代人以及其後的考茨基、普列漢諾夫（Plekhanov）^④、列寧、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等人所發展出來的思想體系。所謂「庸俗馬克思主義」是諸如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者們、斯大林主義者們、赫魯雪夫份子以及其他類似份子的假馬克思主義。）我現在所說的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和庸俗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它相似於馬克思當年所講的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之間的矛盾。你們知道，對馬克思來說，「古典經濟學」和你們倫敦經濟學派那些教科書所使用的同一術語，有著不同的意義。如果我沒有犯錯的話，根據

你們的教科書，古典經濟學持續到十九世紀的最末尾，甚至包括二十世紀的開端，而馬歇爾（Marshall）^{④⑥}也還是它的一部份。對卡爾·馬克思來說，古典經濟學實際上終止於李嘉圖（Ricardo）^{④⑦}。對他來說，其後隨之而來的都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歸類為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在古典經濟學中，馬克思在李嘉圖和斯密（Smith）^{④⑧}那裡看到主要的因素，並從中發展他自己的理論，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那種把價值建基於人類勞動的理論。這是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革命性因素。對於這個革命性因素，資產階級不但不再用它，甚至還怕它。後來李嘉圖的經濟學試圖從人類勞動之外去推演價值。後來的庸俗經濟學派從流過去推演價值；再後，他們把價值整個「取消」掉，建立一個不需要它的經濟學，因為，在人類勞動創造價值的觀念中，已經蘊含著革命的種子。因此，本能地從事思考的資產階級就避開它，驚惶地轉變方向。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思想，已經指明資本主義運作的內涵，其程度已經超出資產階級實際所需要的範圍。

對資本主義了解這麼清楚的李嘉圖，知道資產階級既不希望、也擔負不起了解自己之制度的後果，因此，從一開始就必須拋棄勞動價值理論。一個主義和一個理論對社會制度的運作所提供的洞察力，遠比社會階級所想要的實際要求大得多——這種現象在歷史中有時會發生。在馬克思主義中，它已經發生了。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本體，提供如此深入、寬宏，而且至今尚未窮盡、尚未完全發掘和豐富洞察力，以致於使得勞工階級在實際目標上面似乎並不需要它。這種現象，羅莎·盧森堡在《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時，曾經一度表白過。她說：歐洲社會民主運動以第一卷《資本論》作基礎——也就是說，以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片段作基礎——做

了三、四十年的宣傳鼓勵工作；接著來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在我們眼前建造了巨大的架構——然而，勞工運動一點也不感覺自己是在不足的基礎上從事實際的和理論的活動：即使只用到《資本論》的片斷，其學術內容可以說已經相當足以維持勞工運動在智識上活動數十年。

馬克思為他的著作所要服務的運動，創造一個遠比運動所要求的狹窄需要超過很多的思想本體（body）。接著，來了庸俗化，它與原本的主義形成尖銳的對比，但是，它却也反映了勞工運動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來臨的革命的需要。我希望我已經把我在什麼意義下使用古典馬克思主義及庸俗馬克思主義這些術語說明清楚了。我要總結我的說法：古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運作和資本主義解體的前景，提供深刻的洞察力，而且更廣泛地指出：在這個制度下，個人與其他人們之間的關係，他的階級和其他階級的關係，以及他對當代科技的關係和態度。庸俗馬克思主義並不需要所有那些洞察力；它對所有這些的一小部份，就已完全感到心滿意足，它把這些認識侷限在一個大受限制的軌道內——在這個軌道內只有實際的需要、實際的鬥爭和實際的目標。我們現在患了歷史性的實踐肥大症和思想萎縮症。實踐有時是思想之敵；思想有時會因為接觸實踐而受到損害。實踐不可能長久地忽視理論：這是辯證法透明易懂的一種形式。然而，在一些暫時性的過渡期，理論和實踐之間還有尚未解決的緊張關係；而我們所度過的最近數十年，正是這樣一個時期。這些尚未解決的緊張關係，影響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整體結構。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結構，完全建基於這麼一個假設，即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於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社會。然而，在這個十年期內發生於後資本主義的三分之一世界的庸俗馬克思主義，

却完全建基於革命發生在不發達社會這一事實。那麼，這一點如何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結構呢？

如果革命是發生在成熟的資產階級社會，那麼你們就可以假設，而且事實上你們也可以立即看到物質的豐盛、商品的豐盛、生產資料的豐盛和消費資料的相對或絕對的豐盛、人類技術、工具、能力、資源的豐盛以及文化的豐盛。如果革命是發生在不發達的社會，則我們估計到的、基本的、決定性的、確定的因素，乃是全面性的匱乏（scarcity）：生產資料、消費資料、技術、能力和學校的匱乏，文明和文化的匱乏——全面的匱乏——豐盛或特別豐盛的，只有革命的因素。如果豐盛才是革命整個結構和革命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那麼，政治自由則是你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因素。即使革命必需內戰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也僅僅被當作採用專政來表達如下唯一目的的過渡階段：摧毀原先諸佔有者階級的武裝反抗，而不是被用來訓練並強迫工人階級甚或該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使他們聽話。即使曾經講過的話，馬克思也絕少講到「政治自由」。恰恰因為他假設革命發生在成熟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才如此這般地把政治自由視為理所當然，而僅僅談到所謂自由的高等數學以及那些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存在的真正自由的極致。在物質匱乏的基礎上，並不存在著自由。在豐盛的基礎上，無需存在著尖銳的差別工資尺度，斯達漢諾夫主義（Stakhanovism）^④和其他制度、以及詭計，這些將使驚人的不平等再度被製造出來。正如我從前爭辯時所常常說到的，在一個像蘇聯這麼一個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國家，却只能生產五千萬雙鞋子的社會，這種不平等乃是避免不了的。這是我的理論和明喻；但是，把它應用於幾乎所有的未開發國家，在某些方面仍有有效。

在一個發生於豐盛和日益成長的平等社會中的革命，無疑地存

在著文化實體（matters）的限制。這個強制和限制，以無產階級及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呈現在你們的面前。文化領域的限制，僅僅來自政治恐懼。檢查員沒收詩篇，因為他們害怕這些詩篇會變成政治宣言。當檢查員取走「社會現實主義」小說時，他們是在針對來自詩人、來自工廠或大學的平凡青年的反抗或革命的政治宣言，從事預防性的戰爭。學術的限制與政治的限制、匱乏和不平等同行。

古典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設想過「一國社會主義」⁵⁰——不管是在德國、在法國，還是在英國。它的地盤一向就是歐洲，至少是西歐。雖然在實際歷史的發展中，它以國家為單位；在外觀上，它一直是國際主義的。斯大林把社會主義視為以經濟甚至文化自足為基礎的單一國家的架構裡面。這一點大大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它乃是孤立的俄國革命的錯誤反映。直到今天，東方的蘇聯、中國，以及東歐的多數斯大林主義者的思維方式，還被傳統和「一國社會主義」的言外之音的不言而喻的假設，也就是說，還被自給自足、自我封閉的社會主義所塑造著。因此，當你們面對匱乏、不自由、不平等、文化和學術的強制以及一國範圍的社會主義，並因而導致民族主義的復辟鬥爭時，你們就能拿當前所流行的、從青年馬克思的話中引用出來的所謂異化（alienation）。這是異化的一種新的形式；人感到和社會疏離；他成為對他而言好像是盲目的社會力量的玩物。他自己是這些力量的組成部份，這些力量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他却成為這些力量的受害人。對馬克思來說，在一個從成熟的資本主義文化的豐富土壤中成長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和社會的分離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和馬克思的期待相反，革命並不發生在那些被人們公認為西方文明搖籃的歐洲諸國，却發生在東方。在那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可能被製造出來。如

果沒有它的物質基礎，它怎能發生呢？在那裡，人民只能從事作為社會主義之前提的原始積累；而這一點，他們正在加以實現。我們不要目空一切，也不要小看他們的宏偉目標和宏大成就。他們耽擱很久，但却也正在學習西歐國家幾個世紀前已經知道的東西，但是，他們也知道了一些西歐諸國所從未知悉的東西。發展是複合的。它既有倒退，也有驚人的進步——忽視歷史上的這些矛盾方面，將是不切實際的。

人們將質問我：「那麼西方為什麼對馬克思主義的訴求相應不理呢？」革命首先發生在 1917 年的一個不發達而且落後的國家；它除了有著輝煌而且奇異的藝術—文學成就以外，整個社會結構不發達而且落後。整個大廈浮建在不穩定、不健康的基礎上面，並且調整自己以便適應既存的落後條件。老共產主義者經常充滿著大難臨頭時的幽默歎息道：「難道上帝不能幫助我們，使激變發生在比農民的俄國更適合的國家嗎？」不，上帝並未幫忙。因此才有現代革命與古老的陰暗傳統背景間的不和諧。這給西方革命發展的可能性提供了負面衝擊。在一個從未熱烈希望達成社會主義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生的革命，會產生一個在諸多方面看起來好像是社會主義的拙劣模仿品的雜種東西。西方工人雖然似乎比較不關心政治，却也經常非常小心地關注各種事物，並因而相當了解革命後俄國人民的匱乏、飢餓和清苦生活；他知道他們面對著恐怖和迫害。英國工人、德國工人甚至法國工人都非常單純，以致於經常懷疑：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嗎？難道在我們對社會主義作了世紀之久的獻身之後，跟隨而來的竟是令人捉摸不定的東西嗎？工人們已經向自己質問了這些問題。西歐之人既沒有把握，又感到遲疑，因此比較喜歡等著瞧。俄國革命對西方革命便如此地扮演著阻撓者的角色。

大體而言，我們必須注意西方的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和西方

階級鬥爭的道路之間的關係，把它看成是一場歷經幾個世代、為期一個半世紀的戰爭。而這個階級戰爭有它的盛衰、它的間隔、它的對陣戰以及它在戰鬥和戰役之間的長期和緩。在兩個對陣戰之間的和緩期中，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說：「啊，你們馬克思主義者說什麼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但現在却沒有階級鬥爭。」當然，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出人類歷史是階級戰爭的歷史時，他完全理解其間存在著階級戰爭處於極低且幾乎停滯的時期。邱吉爾（Churchill）一度寫道：人類的歷史是戰爭的歷史——他也許是一個無意識中向馬克思剽竊的人吧？當然，不同點在於：對馬克思來說它是階級戰爭的歷史，而對邱吉爾來說，它僅僅是戰爭的歷史。但是，邱吉爾也了解，戰爭並不是永無休止的進行者；同時，馬克思也了解，階級戰爭有它們的休戰期、公開戰爭期、潛伏的鬥爭、低潮和間歇。

我們有過為期多個世代的反資戰爭。1848年、1870年、1905年、1917~18年、1945~46年；所有的大戰以東方革命的勝利和西方革命的重創（或大敗）作為部份結論。馬克思從未預示革命會在日曆表上的哪一個特定日子達成勝利。他所預測的全部內容只是：即將有階級相互之間與人民相互之間的重大而有時導致流血的鬥爭，一場將要經歷幾個世代的鬥爭，而且，如果到那時，文明沒有崩潰且化為野蠻，它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解體，並出現社會主義。而與此同時，當然也有著一切反革命力量的動員。現在樂於指出馬克思的那些未能實現之預言的人——難道他們真是如此想像（怎麼說才好呢？）把馬克思想像成和批判馬克思的批評家們一樣淺薄，以致於認為通往社會主義的路上，不存在著反革命的阻礙物嗎？全世界的反革命以所有不同的形式——從法西斯主義到最細緻的社會民主的改良主義——動員起來，去維護既存的社會秩序。那些

勢力從社會主義軀體上的每一個國難、每一處創傷當中獲取利益。除了像巴黎公社那種特殊時期以外，勞動階級動員的激烈和強度，遠比不上支配及統治階級在幾乎永久性的地位上所保持的動員。即使在公社時期，起義也從未真正動員成生死鬥爭——我們可以從一些描述看出他們的輕浮，他們高興而且和善的樂觀主義。

當我提到古典馬克思主義和它的有效性時，我對馬克思的真髓已經了然於心。馬克思於 1848 年在政治上相當活躍；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們和恩格斯，在信中他表示，希望勞工運動在一年的時間內、在兩年或三年內獲得革命的衝力。其後，恩格斯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後，寫信給他的信徒——在西歐，他有不少信徒——傳達自己希望仍能活著看到英國、法國、和德國工人團結起來的願望。他們會有這些樂觀的期待，毋寧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們仍然是可以從自己正在關心而且權宜地捲入的事件當中退後一步來觀照歷史前景的思想家。在這樣子的馬克思——他給第一國際建立基礎，並且希望迅速地、非常迅速地造成大動盪。但是，也有這樣子的馬克思——他撰寫《資本論》，並且不在這本嚴密的科學及歷史著作當中作出任何預測或預言，而僅僅從他對資本的深刻、精細而且謹慎的分析當中得出結論——這個制度的內部矛盾終究會使它無法運作且必定崩潰的結論。至於到什麼時刻它才會解體或崩潰——這一點他從未觸及，不是（像很多批判他的批評家所設想的那樣）因為他很聰明，而是因為他有責任感。一個政治家或許必須依賴某一段時期內發生的特定事件；他可以糾合他自己、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跟隨者的力量，以對付即將來臨的鬥爭。歷史思想家就不能這樣做；他也不可能預見歷史的複雜情況或制定它的精確路線。

我說過我要集中說明馬克思的精義，而我已滑入無關緊要的地方，因此，就讓我再觸及另外一個勉強夠格的問題吧——也就是工

勢力從社會主義軀體上的每一個國難、每一處創傷當中獲取利益。除了像巴黎公社那種特殊時期以外，勞動階級動員的激烈和強度，遠比不上支配及統治階級在幾乎永久性的地位上所保持的動員。即使在公社時期，起義也從未真正動員成生死鬥爭——我們可以從一些描述看出他們的輕浮，他們高興而且和善的樂觀主義。

當我提到古典馬克思主義和它的有效性時，我對馬克思的真髓已經了然於心。馬克思於 1848 年在政治上相當活躍；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們和恩格斯，在信中他表示，希望勞工運動在一年的時間內、在兩年或三年內獲得革命的衝力。其後，恩格斯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後，寫信給他的信徒——在西歐，他有不少信徒——傳達自己希望仍能活著看到英國、法國、和德國工人團結起來的願望。他們會有這些樂觀的期待，毋寧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們仍然是可以從自己正在關心而且權宜地捲入的事件當中退後一步來觀照歷史前景的思想家。在這樣子的馬克思——他給第一國際建立基礎，並且希望迅速地、非常迅速地造成大動盪。但是，也有這樣子的馬克思——他撰寫《資本論》，並且不在這本嚴密的科學及歷史著作當中作出任何預測或預言，而僅僅從他對資本的深刻、精細而且謹慎的分析當中得出結論——這個制度的內部矛盾終究會使它無法運作且必定崩潰的結論。至於到什麼時刻它才會解體或崩潰——這一點他從未觸及，不是（像很多批判他的批評家所設想的那樣）因為他很聰明，而是因為他有責任感。一個政治家或許必須依賴某一段時期內發生的特定事件；他可以糾合他自己、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跟隨者的力量，以對付即將來臨的鬥爭。歷史思想家就不能這樣做；他也不可能預見歷史的複雜情況或制定它的精確路線。

我說過我要集中說明馬克思的精義，而我已滑入無關緊要的地方，因此，就讓我再觸及另外一個勉強夠格的問題吧——也就是工

人階級在資本主義下是否註定絕對貧困化的問題。這一點在歐洲共產黨，尤其是法國共產黨中，已經被人們長久而且熱情地討論過。嗯，在馬克思那裡，你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來支持這個理論，同時，你們也可以找到另一些理由來駁倒它。馬克思的見解實在太豐富、太複雜了，以致於難以用狹隘的公式來加以表達。在馬克思當時的西歐，存在著一些有經驗依據的事實，表明了逐漸的和絕對的貧困化。

但是，我們還是回歸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最精要點吧。當人們說馬克思主義在十九世紀是一個高度精緻、切實的主義，而現在却已經過時，我們要質問：什麼地方過時了？是它的精髓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之批判的精髓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它非常簡單，而且非常明白，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秩序的所有多面分析，全都集中在這一點。它是：在生產過程日益增加其社會化特質和資產階級財產的反社會化特質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矛盾。老式的自由生產者（freelance）不再像在前資本主義制度中那樣一代傳一代，大家互相獨立地生產；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整體的生產方式，已經越來越社會化。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單元、每一個部份、每一個小小的器官，都和所有其他的互相依賴。整個生產過程變成單一的生產的社會過程——而且不只是一個國家範圍的生產過程，它是一個國際的生產過程。而同時，你們却有一個反社會化的財產，私有財產。財產的反社會化和我們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一切無政府主義及非理性的泉源。

這個矛盾終究是不能調和的。衝突必將來臨。馬克思所說的就只有這點。那麼，對資本主義的這個主要批判已經過時了嗎？有人告訴我們：它已過時，而且自從凱因斯（keynes）^①以後，資本主義知道如何計劃它的經濟。在八十個年頭裡面，「經濟」計劃被

看作是馬克思帽中的蜜蜂（a bee in Marx's bonnet 譯者按：指胡思亂想）。如今，這隻蜜蜂被捧高而幾乎成爲聖蟲（divine insect），而人們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也可以作計劃。除了爲達成戰爭的目的以外，它哪裡曾被計劃過？如果有的話，我可未曾聽說過。不過，就假設它可以吧。計劃是否適合於資本主義？過去，有些資本主義企業畢竟是採用封建的基礎來進行的；我想，人們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仿造品吧。然而，它適合於資本主義嗎？同時，即使資本主義作計劃，它有沒有可能獲得像真正公有經濟作計劃時所能獲得的那種成長率呢？當然不可能，因爲如果有國家或國際的計劃，那麼，國家或國際的所有制才是計劃的相宜而且自然的條件。當然，你們可以把計劃用於資本主義，但是，這就好像把一個汽車引擎放在馬拉的 drozhka 上。同時，資本主義可以創造國際社會嗎？你們或許會問：那麼蘇聯人和中國人又如何呢？他們可曾創造過一個國際社會？當然沒有。蘇聯人和中國人處理自己事務的方式，仍然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但是，在那裡存在著的是資本主義的反映，資本主義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種投射；而在這裡的却是資本主義秩序有史以來一直固有的整個活動方式。不管任何時候，當資本主義試圖突破國家的硬殼時，它總是採取大災禍的形式，或者發動世界大戰，或者吞食較小、較弱的國家或競爭的對手。

如果你們察看資本主義在戰後將近二十年的繁榮，你們看到什麼？對馬克思主義的駁倒嗎？我們看到免於老式的蕭條和景氣的二十年過去了，這並非歷史上的第一次，而這種蕭條和景氣，在最遲從 1825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內，一向是資本主義的特徵。在 1870~71 年的普法戰爭之後，德國曾有二十五年的非常驚人的工業化，此一工業化是免於真正之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二十

五年的末尾，產生了修正主義者。他們是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朋友和信徒，他們說：「大師們一定錯了。他們說會有一次崩潰，會有危機，會有蕭條。但是蕭條沒有發生，從今以後資本主義將以演化的方式順利地發展下去。」但在僅僅幾年後的1907年，驚人的崩潰來臨了。接著的又一次蕭條導引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不想先當卡珊德拉（Cassandra）^⑤，但是，我不能說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進一步順利演化發展抱有信心，或者對它的所謂繁榮的永久性抱有信心。在這二十年的繁榮之後，我們在西方社會中看到什麼？我們看到卡爾·馬克思所診斷的那些會導致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及死亡的所有各種趨勢的強化。我們看到在所有西方國家那些構成資本主義保守基礎的中產階級的消失；小所有者、小佔有者農民的消失。作為法國保守主義主要依靠的農民全然消失，而法國不再是一個農民國家。多數西歐國家也都如此地發生。美國也沒有農民，人口當中只有很小的百分比從事農務。那就是馬克思所預言的：剩下來的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工人階級。數十年來，看來這個特定的預言似乎不對。卡爾·考茨基寫過一篇論農民問題的非常有名的大部頭著作，在裡面，他解釋了在農業方面之所以沒有像工業方面那樣集中的原因。然而，他堅認馬克思的預言正確。列寧接受考茨基的說法，並且指出：農民儘管繼續貧困化，却仍然存在。現在，這些農民也正在消失！無產者的數目正在增加。令資產階級膽戰心驚的無產階級化，每一年隨著繁榮逐漸增加，隨著我們的福利國家逐年增加。生產過程的規模越來越大，越集中化，越社會化，越來越要求社會所有制。各國的生產力，對傳統和統治階級以往所保持的國家自給自足，發出反對的聲音。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地獄景象，它在這個福利國家的樂園當中，幾乎不露形色地，幾乎未受注意地發生了。

在此同時，人們感覺，在西方這裡，階級鬥爭的整個發展過程好像停止了一會兒，並等待著偉大的篇章以便結束。在歷史發展中，有一個大趨勢允諾——但是只是允諾而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局勢全面改觀，那就是：蘇聯以及和它一起的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的成長。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在它對馬克思主義的智識和精神結構產生過極大的扭曲之後，如今已經不再需要跑很長的路程了。我不知道這是否要十年或二十年的時間，但是，這個發展可以完成，只要蘇聯這個未開發的落後國家和與它一起的其他國家，最後完全變成現代化工業國家——只要這些有教養的國家（不管其他條件為何，只要它們仍然保有社會主義的傳統）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和世世代代社會主義者所夢寐以求的、實行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物質及文化的豐盛，政治及文化方面的不受束縛，日益成長的平等，以及日益成長的國際主義。

儘管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有著非常醜陋的喧鬧，我仍不會懷疑那些國家的社會制度，比它們的領導人來得聰明、來得進步。社會制度將迫使它們的領導人接受國際主義，即使他們是太陽底下最大的沙文主義白痴；它們會把他們既推又拉地擠到一旁，並且把一些會接受國際主義籲求的人擁上台，今日，這種籲求來自整個人類。而且，當這件事發生時，這些國家的發展，將不只趕上古典馬克思主義，還可能超越它。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深具信心地展望馬克思理論和實踐再度一致的前景，即使它未必會早早到來。你們和你們的同代人應全心注視這個前景，那時的馬克思主義制度，將不再是我們當代人所過的馬克思主義制度——這種從落後性、落後文明和落後社會所扭曲的三稜鏡透視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制度。我希望你們這一代人可以看到這個新的高潮，這個新的馬克思主義的興旺，不因任何智識的衰敗而失去光彩。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曾經是西歐的產品。它們已經走出西歐，去征服世界，並喪失了自己的西歐基地。它們幾時才會回來呢？在中世紀，義大利曾經是其他歐洲國家學習資本主義藝術的對象。義大利城市、義大利經濟學家以及義大利銀行，是歐洲資本主義先鋒。後來，在十九世紀，當幾乎整個歐洲都已資產階級化時，義大利却還沒有達成它的資本主義。在整個歐洲已經接受資本主義以後，資本主義才姍姍來遲地回到義大利。西歐會不會是社會主義的義大利？我們是否要等待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征服整個世界，然後站在那裡，排在最後面，等待它回來我們當中？或者我們應該從越來越甚、越來越可怕的落後當中，把自己拯救出來？

(1987.5.6 譯；1987.6.1 校)

•

③ 暴力與非暴力

《暴力與非暴力》是羅伊徹寫給德林杰（D. Dellinger）為越南日抗議於 1966 年在〔加州〕伯克利（Berkeley）舉辦的一個討論會的授稿的修訂版。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從它一開始並經歷 1848 年到 1966 年之間的所有歷史性蛻變，都隱含著一個完整的暴力與非暴力的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一向全都宣揚無產階級專政和以武力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我們一向全都試圖給各國工人階級加深這麼一個印象：他們必須準備戰鬥，甚至採取內戰來反對壓迫和統治階級。過去，我們對那些懷疑我們是否有權利如此宣揚、質疑我們是否有必要如此宣揚的人，無不報以相當諷刺性的回答。但是，這裡存在著辯證的矛盾；到底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如何呢？關於那個人人不再被別人剝削和控制的無階級社會與無國家社會的看法。左派當中有很多人認為，改造社會，從而使社會與個人之間和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所永遠必備的暴力規範永遠消失的熱望，乃是馬克思主義當中的空想成份。

我堅持認為，就接受非暴力社會的遠見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比任何主張非暴力的和平主義佈道家所曾做過的，來得深，來得遠。為什麼呢？因為馬克思把我們這個社會的暴力根源揭露出來，而其他的人沒有做到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已經開始要拔除那些根源；不但從人們的思想中，不但從人們的感情方面，而且根本就從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上面，把暴力加以根絕。馬克思主義已經看出，社會的階級對立滋養了暴力——而評定馬克思主義時，必須把基督教宣揚非暴力的二千年的、徒勞無功的紀錄拿來作對比。它沒有產生任何實際的成果，也沒有實際縮小暴力，在這種意義上，我說它徒勞無功。在兩千年的宣講「愛你的兄弟」之後，我們正處於這樣的現況：那些上教堂的人們投擲燃燒彈，而另外一些也是在基督教傳統中被帶大的納粹們，則把六百萬基督同鄉的後代，投入殺人的毒氣層內。經過兩千年的宣揚之後，非暴力的佈道竟然還導致這種事情！諸多理由之一，是因為暴力的根源從來沒有被捶擊、被

掘出。既然階級社會仍然維持不墜，所有這些佈道，即使當中多數是誠心誠意的，即使基督教的教師全心投入去做，它們當然註定要徒勞無功，因為他們攻擊的，僅僅是暴力的表面。然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也已經出了毛病——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歷史，充滿著深刻而且悲劇性的矛盾。如果研讀列寧論革命的著作，那些似乎以一種非常教條的形式寫出來的，幾乎像是解釋聖經詞句的教會教科書的著作，人們就會看出，俄國革命的根源深處，存在著對於非暴力的何等強烈的夢想。在這些多少類似教會的慣用的辭彙背後，經常湧現出無國家社會的夢想。根據所有不含善意的目擊者（例如當時住在彼得格勒的西方大使們）的報導，十月起義發生時，所有各方的犧牲者，總共只有十個人。那就是偉大的十月起義的犧牲者總數。指導這次起義的人——列寧、托洛茨基以及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已經考慮過暴力和非暴力的問題，他們在組織這次異乎尋常的劇變時，對於敵人和己方人員的生命，有著深切但未明說出來的關懷。俄國革命從名稱上看來，似乎充滿著暴力，其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具有相同規模的變動當中，它乃是最不具暴力的一次行動！

革命不是依靠槍桿取勝的，是依靠言辭、依靠爭論和說服取勝的。言辭很暴烈，言辭極端強而有力，但是，這只不過是用來反叛暴力的現實，用來反叛犧牲百萬人生命之世界大戰的現實的一種感情上的暴力而已。近日來所有那些要向俄國革命的製造者們宣揚道德的人，當然都採取一種態度，他們假設一個美好的、天使一般的現狀，一種天使一般的非暴力現狀，被那些受到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③ 所迷惑的惡魔革命者所攪亂，而這些人把隨意處置人類生命的權利撥給他們自己。在布爾什維克進行這次犧牲十個人生命的偉大革命的同時，大約正有一千萬人，死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戰壕之中。

在那被你們稱爲非暴力挑戰的東西當中所固有的深刻而且廣泛的人道主義，已經作爲首要成份，存在於馬克思主義當中。我們有點不好意思談論人道主義；我們之所以不好意思去談論它，是因爲歷史上的哪一個惡棍不曾談論它呢？——斯大林沒有嗎？希特勒沒有嗎？戈培爾（Goebbels）^{⑤4}沒有嗎？我每次聽到左派人士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建議用人道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我總是感到相當的震驚。馬克思主義所需要的，其實只是忠實於它自己！

那麼，在俄國革命這個非常有希望的開端以後，在列寧寫完那本用馬克思主義辭彙來表達對於非暴力的偉大革命美夢的《國家與革命》以後，事實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其他宣揚非暴力的人，例如克倫斯基（Kerensky）^{⑤5}，却以重新援用死刑來處罰拒絕作戰之前線士兵的方式，來向被壓迫著宣揚非暴力。或許，那些真正嫌惡暴力的人們，心中有一種天生的特性，極不好意思去提非暴力。我無法信任那些兩唇之間講出這麼多高貴言辭的人們。我往往比較信任那些坦白、甚至鹵莽地表示政治鬥爭之必要性的人，只要他們沒有被自己的正義感沖昏了頭。

接著來了干涉和內戰。就好像當前的越共必須使用規模越來越大的暴力一樣，那時的人們必須使用規模越來越大的暴力。他們無可奈何；他們或者選擇屈服，要不然就只好使用暴力了。然而，即使在內戰當中，布爾什維克又怎麼做呢？他們又一次試圖在爭論、說服和暴力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在這種平衡當中，他們仍然把說服和爭論看作遠比暴力來得重要。純粹從軍備方面來看，他們絕對不如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這些人給俄國的白軍輸送軍隊和軍火）。托洛茨基那時所帶領的紅軍，可就差得太多了。後來如何呢？他們對於干涉國的軍隊裡面的士兵和穿制服的工人的理智加以

鼓動、加以籲求。被遣送來鎮壓革命的法國海軍，在敖德薩（Odessa）起而叛變，拒絕攻擊布爾什維克：這是非暴力在內戰中的另一次勝利。水兵的這次叛變，是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宣傳的結果，但是，這種「顛覆」防止了暴力。（1920年，英國在蘇波戰爭（Russo-Polish war）的干涉中，倫敦的碼頭工人舉行罷工，拒絕運輸軍火對抗蘇俄，使得倫敦的碼頭無法調動——這也是非暴力。）

接下去是孤立俄國革命的大悲劇；在並非由布爾什維克發動的干涉戰爭、內戰和漫長而令人疲乏不堪的世界大戰中，俄國革命屈從於難以置信、難以想像的破壞、貧困、飢餓和疾病的大悲劇。所有這些所導致的恐怖，在蘇俄發生了。人們失去了平衡。甚至連領導者也失去了思維和心靈的清醒。他們在極度不人道的壓力下行動。我不想審判他們、歸罪他們或者替他們辯護。我只知道這個歷史過程的深刻悲劇性質，其結果是對暴力的頌揚。

然而，使得一個杯子大小的暴力變成滿滿幾桶，甚至匯聚成河流，又算是什麼呢？這是俄國革命的悲劇。馬克思主義中暴力與非暴力的辯證，竟然被翻倒，最後，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非暴力意義受制於大量壓倒性的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之含蓄地指責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有關國家逐漸消亡的想法，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正是這個想法，集中表現了整個馬克思主義的非暴力性質。斯大林主義政權不能夠容許、不能夠忍受那個夢想的殘存。它為了替自己的暴力作辯護，必須從人們的心目中把這個夢想搗碎。我這麼說，無意把整個事情歸罪於某個個人。事情複雜得多了。這是一個因為孤立而且受制於貧困的革命在孤立和貧困當中不能履行其諾言所造成的悲劇；承諾和履行諾言之間，夢想和現實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使得一個被這種悲劇境遇所攔獲的革命，沈淪於非理性了。

對於這種後果，馬克思主義本身要負什麼程度的責任呢？把斯大林主義等同馬克思主義，並從而把斯大林主義所已經做過的事情，來歸罪馬克思主義，是不對的。相反地，和斯大林主義劃清界線，並說我們對斯大林主義無需負責，說那不是我們的目標，這樣做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是一種缺乏道德勇氣的表現。如同基督教須對波吉亞家族（Borgias）^{⑤⑥}負責，馬克思主義也須對斯大林負類似的責任。波吉亞們並不是基督徒，但是，基督教不能夠把波吉亞們從它的紀錄當中抹殺掉。我們也不能從我們的紀錄中把斯大林主義取消掉，雖然我們無需對斯大林主義者的罪行負責。我們（當我說「我們」時，我是指我個人精神上所認同的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我是指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以及早期歐洲的共產主義領導者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了這個對於暴力的頌揚，因為我們把它當作自衛的技巧。羅莎·盧森堡在批評這種態度的最早的怯懦跡象時，她已了解這一點。

然而，問題遠比單純的人類意念來得更大、更深。暴力並非根植於人類的意念。我們應該說，人類的意念乃是物質因素（material factors）和物質需要（material necessities）所借以傳遞它們之壓力的機構——心理和觀念的機構（psychological and ideal mechanism）。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估計到，會有人基於簡單的理由，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做出如此極端的暴力成長以及如此極端的暴力濫用。馬克思主義設想，革命永遠是以暴力形式發生的社會變遷行動，但是却有需要得到廣大人民大眾的支持。它設想革命發生在工業化的西方，藉著追求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全心支持革命，並對抗實際上屬於極少數的剝削者敵人而達成。在這種革命的多數人與反革命的少數人的對抗之中，使用暴力的需要實在有限，而非暴力的美夢，也有很大的希望達成。

人們說，馬克思主義適用於未開發國家，不適用於先進的工業西方。我仍然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原來的夢想和馬克思主義原來的真正啓示與希望，仍然適用於工業的西方，而且遠比不發達國家來得適用，即使在革命的某些階段，革命必須是大多數人的工作，正如 1917 年的俄國、1949 年的中國以及今日的越南所顯示的那樣。在未開發的國家當中，革命後會再有一段時間，存在著諾言和履行諾言之間的缺口。因此便會有挫敗感、爆炸性的不和協以及革命後領導者依照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去保障革命安全的意願。國家越不發達，在革命之後越注定會有一段時間的痛苦現實和暴力。

然而，我認為發生在中國的暴力已經遠小於發生在蘇俄的暴力。我認為，中國革命儘管還有不知多少的非理性，它的非理性已比俄國革命遠為輕微。但是，中國革命不是第一個先鋒，不是孤立的革命：它已經得到斯大林主義蘇聯的幫助，正是這一點減少了非理性的程度。我認為，隨著革命的擴散，隨著革命社會在工業和科技的進展，隨著它們財富的成長，隨著它們生活標準的提高，以及隨著人民大眾的相對滿足，非理性因素自會減少。當社會主義進階到先進國家時，馬克思主義的非暴力美夢，就可以得到最後的證實。那是我的信仰，它不是如意算盤，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把我引導到這個結論。我認為，蘇聯的非斯大林化儘管是不完全的、自我矛盾的、不足夠的以及虛偽的，它已經減低了暴力，並給馬克思主義的非暴力成份以更多發展的機會，從而使得俄國革命中互相矛盾的成份，重建起某種程度的平衡。

你們曾經問我，當我提到越戰對共產主義世界的負面影響時，我指的是什麼。越南的戰爭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暴力潮流一次新衝突的前奏曲；這個暴力潮流正從西方世界湧回來，而且將再度淹沒世界。對於這個極大暴力的恐懼，在蘇聯和中國，正促成獨裁主義

和暴力傾向的再發作。我把越戰對共產世界的效應，和斯大林時代最後幾年發生的韓戰的影響，當作相似的東西。韓戰所釋放出來的恐懼和痛苦，在蘇聯，以斯大林最後幾年統治的愚行表現了它們自己，以三十年代一再發生的「惡魔的晚宴」(witches' sabbath)表現了它們自己。我無法預見，也不害怕蘇聯爲了回應美國入侵越南所做出的令人恐怖的事情，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一些獨裁主義傾向的重燃。第二十三屆共產黨大會證實這一點。對於丹尼爾和辛雅夫斯基之審(the trials of Daniel and Sinyavsky)，已經顯示獨裁主義傾向部份復顯的徵兆。

相反地，我不認爲我們可以說韓戰只有一種效應，就是在蘇聯和中國鼓勵國內暴力的效應。與它對我們這邊的世界所已經產生的效用相同地，它也有正面的效應。它給人們一種和小國團結的意識，這種小國正遭到世界上最強、最大、最富的國家如此粗暴地加以攻擊、如此粗暴地加以征服。韓戰使人們拋棄了赫魯雪夫主義所散佈的一些幻想；那就是，在諸如義大利和法國之類的國家，可以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幻想。不妨現在就去見見法國和義大利工人，試著告訴他們吧：在小如韓國和越南的國家裡面，都要引來資本主義列強如此的阻撓了，而他們却有可能完成這種奇蹟呢！

不管任何時候，只要我們被驅策而不得不使用暴力時，作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我們必須知道，並且通告那些我們將要呼喚出來行動的人民：暴力乃是必要的惡。必須同時強調形容詞和名詞：既強調「必要的」，也強調「惡」。向那些永遠是暴力所施加之對象的人們宣揚非暴力尤其不對。我認爲，從蘇聯的歷史應該得到的教訓是：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必要的惡。但是，如果我是越南人，而且

身列越共當中，我會告訴我的武裝同志，我們不應該把痛苦、可怖而却非做不可的暴力引以為榮。但是，我們身處西方——在這裡，這種說法有更大的可能性會被人了解，並加以接受。

在西方的左派當中，我們必須鼓吹一種不逃避現實的思維方式。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共享無國家社會的美夢，但是，我們質問：你們如何達成這個美夢呢？而，正是在這裡，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及純粹和平主義者分手。你們接受這樣的看法：越戰不是歷史的偶然；它表現你們社會的結構，表現你們與外在世界之關係的帝國主義特性。如果你們接受這一點，你們就暗示了社會秩序必須加以改變。如何加以改變呢？那些人既然已經拒絕把任一吋的越南土地拋給他們的階級敵人，他們有沒有可能不保衛現狀而把美國的領土拱手讓渡給社會主義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採用非暴力的方法來加以改變呢？你們能夠想像這種可能性嗎？我能夠想像出這種可能性，但只有在一種條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當你們已經擁有絕大多數的美國人，為了帶來社會主義，他們情願使用武力——只有到了那時，社會主義才有可能不使用暴力而征服美國。革命的本錢在於它的道德至高性。你們看得出來，相對於俄國革命來說，如果你們在美國社會取得社會主義的道德至高性，那麼你們就有可能只要行使極小量的暴力。但是——在這裡又有著辯證——只有在不以暴力為榮時，我們才能準備去使用它。

（1987.5.9 譯；1987.6.2 校）

④ 論社會主義 社會的人

《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是羅伊徹於 1966 年在紐約第二次社會主義學者會議（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in New York）所作的演講；它首先於 1967 年在紐約由梅里特出版公司（Merit Publishers, New York）用小冊子的形式出版。

我被要求向你們演講，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這個主題很大，需要從很多的角度、用很多的途徑來考察，因此，如果你們認為我所說的，像是有點漫談性的隨筆形式，而不是系統性的演說，那我要先請你們原諒了。

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者不願意談論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而且，我必須承認，當人們建議我用這個題目演講時，我自己也多少感到同樣的不情願。任何正面描繪將來無階級社會中的成員的企圖，註定會有一些空想的意味。過去，這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幻想家們的領域，尤其是聖西門^⑧和傅利葉^⑨，他們如同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者那樣，想像他們——而且是通過他們的理性——最後已經發現理想的人，而且一旦發現了，註定接著而來的就是實現。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後幾個世代的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曾在這個方面提出任何進一步的看法。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告訴人類：「這就是理想，向它跪拜吧！」他們並沒有把即將來臨的社會的藍圖給我們，相反地，他們盡其全力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過去和現在，作深入而又實際的社會分析；面對著他們那個時代的階級鬥爭，他們心無二意地投身於無產階級的事業。

然而，在照顧他們那個時代的需要的同時，他們對將來並非不理不睬。他們至少試圖猜測即將來臨的事物的樣子；但是，他們在陳述自己的猜測時，作了極大的保留，同時，他們對此也只有偶而為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一切大部頭著作中，對於我們現在要討論的題目，僅僅提供少數零星分散的暗示，這些暗示很有意義地互相關聯在一起，提出廣大的新視野，然而，僅僅是暗示而已。毫無疑問地，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有他自己的想像，但是，這只是分析家工作用的假說，不是幻想家的靈感；同時，儘管他深信自己預測的歷史現實性，他還是抱持一定份量的懷疑來對待

它們。

爲了解釋他自己的說法，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子宮裡面，細察社會主義的胚胎——當然，他只能看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胚胎。我必須冒著使你們當中的某些人失望的危險來指出：即使是現在，我們所能夠說的，也就只有這一點。在經歷我們這個年代所發生的所有革命之後，而且在我們對馬克思以後的社會也有所知悉之後，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一點也沒有領先馬克思：在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從這個問題的初級階段踏出一步。對這一點，我們所能夠說的，註定還只能是非常一般性的，片斷而不完整的，以及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反面的。我們比較容易看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不能是什麼樣子，而不容易看出他將是什麼樣子。然而，從反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正面斷言，在這種程度上，我們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反面特性，也可以預示他的一些正面的形象。

在當代生產過程的日益社會化與通過私有財產運作控制這個過程的非社會化性質的矛盾當中，馬克思已經看出資產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導致這個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和非理性的最深刻原因。當代科技和工業傾向於把社會聯合起來，而生產資料的私有却使它解體分裂。這個社會化的生產過程，是包含在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你們喜歡這麼說的話）裡面的集體主義的初期因素，它必須從那些對它加以限制、分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係當中解放出來。在一百多年當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這個矛盾毫無所悉，直到凱因斯和他的跟從者，才用他們自己的折衷方式承認了它，因此，暗中給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納了貢。

但是，這些空前地飽受共產主義幽靈作祟的凱因斯主義和新資本主義所試圖要做的一切，不過是在（諸如壟斷的資本主義公司之類的）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引介一種對社會化生產過程的假社會控

制而已。人們如此絕望地鬥爭，以便保證古代的機構或生活方式繼續存在於一個它們已經不再重要、不再有用的時代，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在我的祖國波蘭曾經看到一個農夫，他偶然得到一輛老汽車，却仍然用馬去拉它。凱因斯主義者和新資本主義者，正把私有財產這匹馬，用來駕駛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子動力車和太空船——而且，爲了防止我們把馬解開，他們還以搖天撼地來威脅我們。

回到我的正題吧：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構想，不是學理上的一種任意構想，而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却經常被它阻撓和否定的一些合理的社會因素對將來的小心翼翼的外延和投射。和這一點類似地，我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構想，也只是一些社會人（social man）的投射，他們可能已經存在於我們裡面，但是被他們生活在其中的條件所扭曲、所壓迫、所愚弄。（即使是當代被異化了的工人，也有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萌芽，因爲在很稀有的情況下，他們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有了真正的認識，他們提昇了階級團結的意識，而且，他們爲自己的解放從事鬥爭。）在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的熱望根植於現實，被現實所支撐，然而却也經常被現實所拘束。

我再重複說一次，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不能是什麼樣子，將不會是什麼樣子：他不可能是敵對社會的產品；他不可能是不但沒有控制，還反而受制於他的產品和社會環境的集體生產者。他不可能是市場這個盲目力量的玩物，也不會是國營新資本主義戰爭經濟的機器人。他不可能是早期異化了的、被嚇壞了的無產者，也不會是我們所謂的福利國家想將工人轉變成的小資產階級的無聊的仿造副本。只有在一個最發達的集體主義社會裡作爲一個集體工人，他才可能成爲他自己。只有這種社會，才有可能把他的社會必要勞動，減少到新的科技所已經提供的最小累贅度。只有在這

種社會中，他才有可能有把握地而不是偶然碰巧地，合理而不是難以預料地，滿足他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只有在這種社會中，他才能夠使用教育出來的識別力和聰明的選擇，而不是使用商業廣告中的無言或叫喊的說服，來指導他自己，以便滿足他的需要和使用他的閒暇。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共同體中，人才能夠發展他所有的生物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才能擴展並整合他的個性，同時，也才能免除他千年來物質匱乏、不平等和受壓迫的黑暗傳統。只有在這種共同體中，人才能夠最終克服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分離，這種使人與人疏離、使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成對立階級的根源的分離——這種分離即使在今日也已經被我們先進的科技證明是多餘的，而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却用盡辦法要使它永存。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只有在我們的文化和文明達到巔峯狀態時，才會完全長高，而這個巔峯我們原可以親眼目睹，但是，我們的財產關係、我們的社會機構以及根深蒂固的情性，却不允許我們盡情地、堅決快速地前進到這巔峯。

我們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構想，常常被批評為不知羞恥的樂觀主義。人們告訴我們，我們也是空想者，我們的歷史、哲學和心理的假設難以辯明。人們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宣傳家所說的「人間樂園」，正和神學家所應允的天上樂園那樣，是難以達成的。我們對這些批評，應該放開心胸來聽取——在這些批評當中，有時也可以發現幾粒真理的穀粒。我們必須承認，對於社會主義本身或者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不只一次抱持過份樂觀的看法。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這些批評當中有很多僅僅表達了瀰漫著資產階級社會和它的理論家們的死亡感，要不然就是我們自己陣營中幻滅感的不合理形式。

因此，有些存在主義者說我們正試圖從人類條件的基本困境中

逃脫出來，並且試圖掩飾隨著我們命運同來的荒謬（*absurdity*）。要和那些從純粹目的論的（*teleological*）前提替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辯解的對手從事任何有成果的辯論，是極端困難的。悲觀的存在主義者詢問這個古老的問題：和時間及空間的無限相比，人存在和活動的目的（*purpose*）與目標（*aim*）何在？當然，我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答案——即使存在主義者也沒有答案。但是，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它假設一個最終極、極抽象的人類存在之目的的需要或必要，而這個目的是永遠有效的。我們並沒有這樣的一個目的，也沒有設定這個目的的需要。我們在自己的存在當中看不出形而上的感覺（*metaphysical sense*），因此，我們在存在裡面也看不出有什麼荒謬——荒謬和感覺乃是同一個硬幣的相對兩面：只有當你們假設了感覺，你們才能說荒謬。

我們所關心的人類條件（*human condition*），不是人在無限時空中的寂寞——在那個無限當中，即使「寂寞」和「荒謬」這種術語也沒有什麼意義。我們所關懷的是處在社會中的人類條件——那是他自己的創造物，他有可能改變它。*sub specie aeternitatis* 的辯解，在哲學上來說是死板枯燥的，在社會上來說是反動的；一般的情況下，它是一種道德中立（*moral indifference*）及政治寂靜主義（*quietism*）⁶⁰，一種聽天由命地把我們的社會條件照單全收的說法。正如從沙特（*Sartre*）這個顯著的例子看得出來的，存在主義者可以高興地在保持前後矛盾，儘管他們持有人類條件具有荒謬性的看法，他們也可以接受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概念。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熱望所作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更具特殊性。對於我們有關人在無階級和無國家社會中可能是和大概會變成什麼樣子的看法，弗

洛伊德用一句老格言來回答：Homo homini lupus。他說，人類相互之間將永遠具有侵略性和敵對性；他們的侵略性（aggressive instincts）本身是生物所註定的（biologically predetermined），並且不會因為社會結構的變遷而受到具有實質意義的影響。弗洛伊德說：「共產黨人相信他們已經找到從我們的惡魔手中解放出來的方法。根據他們的說法，人性本來是全善的（wholly good），並且對隣人懷有善意（well-disposed），但是，私有財產制度腐化了他的本性。私人財富的擁有給予個人權力，與它俱來的，更是惡待隣人的誘惑；而那些被排斥於擁有之外的人，便註定要敵視並反叛壓迫者。如果把私有財產禁掉，把財富列為公有，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分享，則人們之間的敵意（Jil-will）和敵視（hostility）會消失。因為每一個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滿足，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理由把別人當作他的敵人；每一個人都樂意去做他必須做的工作。」^⑥

在我作進一步的說明以前，讓我先來校對一下，看看弗洛伊德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作的總結是否正確。我們真的把人的本質當作「全善」、並對隣人「懷有善意」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當不靈通的弗洛伊德，必然瀏覽過某一些流行的共產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說辭，在其中確實有那樣的說法。然而，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人性並沒有作這樣的假設——這些假設充其量只能在馬克思年輕時代作為費爾巴哈派（Feuerbachian）^⑦時的著作中才找得到。我記得，在我很年輕的時候，這個問題強烈地佔據了我的心，那時，我正在努力熟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試圖通過它來澄清人性的觀念，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梅林（Mehring）、羅莎·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以及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的研究，我得到如下的結論：他們對人性的假設，可以說是中

性的。他們並沒有把人當作「全善」或「全惡」，對隣人是「懷有善意」或「懷有惡意」；他們拒絕接受不受社會條件影響的、不變的人類天性的形而上學概念的假設。我仍然認為我在四十年前^④得到的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人是自然的創造物，但是，正是由於作為人類社會的那部份自然，使他自己和自然區別開來，而且使他自己部份地反對自然。不管我們生命的生物學基礎如何，在塑造我們性格時，社會條件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甚至連生物學的因素，也要從我們的社會性格中使它們折射出來，並且部分地被後者所扭曲變形。包括本能在內的人的性格，到目前為止，在某種程度上還被社會條件所淹沒、所扭曲，只有當這些條件祛除它們嚴苛的扭曲性質，我們才有可能對人的本性中的生物和社會因素，取得一個比我們目前為止一向的看法來得清楚、來得科學的觀念。

我打從心裡深處承認弗洛伊德對心理學方面的知識作過重要的革命性貢獻，雖然如此，我還是要指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然要對弗洛伊德主義提出的主要批判在於：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都太少估計到人的本能驅策（instinctual drives）通過他的改變中的社會本體（social identity）所會引起的折射和變形——雖然如此，正是弗洛伊德使得我們注意到昇華（sublimation）^⑤機制的過程！心理分析到現在只能用來處理資產階級的人——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的人，這些人往往被這種分析當作一般性的人（man of large），他的內心衝突被這種分析以一種超歷史的方式，把它當作人類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秩序下都會發生的衝突，並當作人類條件所固有的衝突。從這個觀點看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有可能被看作僅僅是資產階級的人的一個變種。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自己說過這一點：「取消私有財產時，我們便剝奪了雖然不是最主要，却

也是很重要的，人類侵略嗜好的工具之一；但是，我們絕對無法改變被侵略性所誤用的權力和影響力（power and influence）之內的質變，我們也無法改變天性中的任何東西。」

接著，弗洛伊德作出這個更加明確的斷言：「侵略性並不是財產所造出來的；在原始時代，當財產還很不足的時候，它已經不受限制地統治一切，幾乎在侵略性拋棄它最初的肛門形式（anal form）以前，它已經在育兒室中露臉了。……如果我們把個人對物質財富的權制取消掉，仍然還存有性關係方面的特權，它必然會成爲在其他各方面有立足點平等的人們當中，產生最強烈的憎惡和最暴烈的敵對時的源頭。」^⑥因此人們警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不亞於資產階級的人，對同類也會具有侵略性和敵對性，而且，他的侵略性即使在育兒室中就已經出現。

請注意，當弗洛伊德承認私有財產是一個強大的侵略工具時，他以最教條的方式斷言：它不是那些工具當中最強大的一種。他如何知道這一點呢？他如何測量各種侵略工具的相對強度呢？在這裡，馬克思主義就比較溫和、比較不教條；我們並不宣稱我們作了如何精確的比較測量而能夠比較下列兩者之間何輕何重——性驅策力和本能的侵略性，與社會需要、利益、和不可抗拒的衝動。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裡面，無疑地也會有本能驅策力——要不然又能夠是什麼模樣呢？——但是，我們不知道通過他的個性，這些本能驅策力如何使自己折射。我們只能假設它們對資產階級的人會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不同的影響。（我甚至認爲，因爲一個將來的弗洛伊德，可以從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裡面，直接去觀察本能驅策力的運作，而不必通過分析家和病人的階級心理的暗黑玻璃作模糊的觀察，或通過它那扭曲的三稜鏡來作觀察，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將可以提供心理學家們遠爲豐富、更爲可靠的研究材料和結

論。) 弗洛伊德也無權宣稱財產只是我們侵略本能的一個工具——相反地，財產經常運用那些本能作為它的工具，來製造它自己的各式各樣的侵略驅策力。人在整個歷史當中，畢竟已經把自己組成軍隊，為財產或財產的要求而互相屠殺；然而，除了在神話裡面，他們到今天為止，並沒有為了「性關係方面的特權」從事過戰爭。

因此，當弗洛伊德堅持取消財產不會改變「被侵略性所誤用的權力和影響力之內的質變」，也不會「改變天性中的任何東西」時，他只不過是以假定作為論據從事狡辯而已。而當他進而指出「侵略性……在原始時代當財產還很不足之時候，就已經不受限制地統治一切」時，他甚至沒有懷疑，正是財產的不足，也就是物質的不足，惹起人們對於不足之資源的、把社會分裂成互相敵對之階級的野蠻爭奪，破壞了原始社會的統一。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只有在物質文化的產品和勞務的前所未有的豐足條件下，才可以想像的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入門常識。我有個年老而且聰明的心理分析家朋友，經常歎息道：「啊，但願弗洛伊德曾經讀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他一定可以因此而避免這麼多不對的試誤！」他也可以不致於向那些以 *homo homini lupus* 作為反對前進和社會主義的戰鬥口號的人們提供軍火，這些人為了當代帝國主義真實而又血腥的 *lupus* 的利益，操縱著永恆的人類 *lupus* 的怪物。

我們大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侵略性，會「以它最初的肛門的形式」和其他更進一步發展了的表現，而顯露於育兒室中。雖然如此，很多地方要視包括育兒室特徵在內的東西來決定：我們要設想一個我們今日所熟悉的設於家庭單位裡面的單獨的育兒室嗎？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假說裡面，我們假設他並不住在如當今家庭的任何東西裡面，也不在金錢關係以及女人和小孩對父親的

依靠關係之中。我們假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在孩提時代就比他的前人遠少隸屬父系的權威（paternal authority）當中，或者他將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父系的權威；而且當他成人以後，他在性和色情方面的生活（sexual and erotic life）將不受拘束，或者，無論如何，就順從自己的感情驅策和愛情需要而不致與社會衝突的方面來看，他和一個資產階級的人相比，不知要自由多少倍。他的本能驅策力會以一種我們無法預測的方式，從他的個性當中折射出來，它的方式雖然無法預測，但必然和弗洛伊德所視為當然的模樣不同。

譬如說，人們可以視為當然地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會有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嗎？這個強有力地運作於我們的精神當中的情結，這個至少在女權制（matriarchy）讓位給家長制（patriarchy）社會以來就已經存在的情結，在人類已經從家長制家庭的資產階級形式超越出去以後，是否還會存在？人們可能很想知道，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裡面，這個在我們心中作無意識的道德監護人和父親的超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弗洛伊德把生物學範疇的父道（fatherhood）和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父系權威混淆起來，並認為超我（superego）、戀母情結和其它家長制在個人心靈上的反映，都理所當然地應該永遠存在。

不錯，他似乎對其它的可能性有瞬間的預感。他說：「如果我們也把（性關係方面的權威）這個因素拿走，而允許性生活的全然自由，並因而取消家庭這個文明的生殖細胞，老實說，我們沒有辦法簡單地預視文明發展可能採取的途徑。」^{⑥7}然而，他不可能看出前景，因為對他來說，一夫一妻制家庭乃是文明不可或缺的生殖細胞，而且，甚至在他思考當中，他也和躺在他眼前長沙發上的一夫一妻制資產階級病人分不開。而因此，雖然他不安地承認，我們看不出在沒有當前這種家庭單位的情況下，文明發展會採取什麼樣的

新途徑，他確知人類本性中毀滅不掉的侵略性，將超越階級、社會、國家和家庭，而緊跟著社會主義社會的人。

在這裡，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再一次比較喜歡——一定量的對抗（agnosticism）。當然，我們大致上關心的是由貧困、產品的不足、階級社會以及被人控制所直接製造出來的殘酷和壓制。每當弗洛伊德冒險地走入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範圍，他就很容易受到譴責，說他充當既存社會的辯護者，亂七八糟地指指點點。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從他那裡學到人類本性當中如破壞性和侵略性因素這種現實的重要性。當然，如果人的本性當中不存在侵略性，那麼君主、國王、軍閥、獨裁者、政府以及各式各樣的領導者，確實不可能使得人們像他們所已表現過的那樣具有侵略性——我們的統治者一向訴諸，而且還正在訴諸人的基本本能驅策力。然而，制約於生物和性的侵略性，會在多大的程度上影響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非生物關係，則是仍然有待解答的問題。

我們並不堅持社會主義將解決人類的全部困境的想法。我們首先要對抗的是那些人所造出來、而且人能夠加以解決的困境。譬如說，我要提醒你們，托洛茨基談到包圍著人的三件基本慘事——飢餓、性、死亡。飢餓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當代勞工運動當作敵人的東西。爲了做到這一點，他們自然傾向於忽視或小看人的其它困境。飢餓，或者更廣泛來說，社會的不平等和壓制，也嚴重地使許多人在性和死亡方面的痛苦，變得更複雜、更強烈；難道這不也是事實嗎？

在對抗社會的不公平和壓制的同時，我們也爲了和緩自然加諸於人的那些打擊而鬥爭。我認爲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嘗試，而且正在嘗試要從正確的地方下手解決我們社會所面對的任務。弗洛伊德主義者集中注意力於性，把人的社會問題忽略或小看了。那麼，結果

如何呢？儘管心理分析在理論上十足重要，它的精神治療的實際利益，在我們社會當中僅僅及於一小撮特權的少數人。相反地，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概念，已經鼓舞了人類當中的一大部份，而且，雖然我們取得某些成就，也承擔過可怕的失敗，我們終究立下了些功勞，然而，全世界的心理分析，却一點也沒有減少過那些正使我們的世界沸騰不已的侵略性。

不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將仍然被性和死亡緊跟不捨；我們深信，儘管還帶著性和死亡，他將有更好的裝備來從事對抗。而且，如果他的本性仍然是侵略性的，和資產階級的人相比，他的社會將會提供給他無法計量的、更大更多的不同機會，來昇華他的本能驅策力，以便把它們轉化成創造性的用途。即使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還無法像雪萊所夢想的那樣完全地「免於犯罪和痛苦」，他仍然可能是「無主權的、自由的、無限制的，作為一個平等、無階級、無部落和無國家，而免除一切禮拜和敬畏的人」。正如托洛茨基所預想的那樣，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般成員，仍然有可能成長到亞里士多德、哥德（Goethe）、和馬克思等人的高度，這些人不管有著什麼樣的性本能和侵略性驅策力，仍然具體表現了一些到今天為止的人類的最高成就。而我們假設，「在諸峯之外，新的高峯還會疊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身上，我們看不到人進化的最後和最完美的產品，或歷史的終結，而僅僅看到某種意義下的歷史的起點。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可能真正會感覺到文明加諸於人們獸性（beast）所造成的不安的不舒適，*Unbehagen*。更有甚者，這可能真正是驅使他更進一步演化並成長到超出我們想像地步的內心矛盾和張力的最主要本質。

對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些觀點是，而且應該是老生常談，因此，我也應該為著自己在社會主義學者的會議中提到它們

表示歉意。不幸地，在當前勞工運動社會主義思想的處境中，有一些初步真理需要一再說明，因為它們往往被遺忘，或者爲了某種令人懷疑的政治方便而被歪曲。譬如說，我聽過有人這麼說：我應該分析的適當題目應該是今日蘇聯或中國境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只有當我堅信這些國家已經達成或幾乎達成社會主義時，我才會接受這種看法。我並不接受這個假設，因此，我也不認爲今日的蘇聯或中國社會中的典型的人，甚或先進的人，可以被稱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人。

當然，我們都把蘇聯、中國以及與它們有關聯成無關聯的某些國家，稱爲「社會主義國家」，只要我們的目的在於把這些政權和資本主義國家作對比，來指出它們的後資本主義性質，或者指出它們的政府及政治的社會主義出身（origins）和社會主義靈感（inspirations），我們有權這麼做。但是，在這裡，我關心的是沒有在理論上正確地描述它們的社會結構，和在這結構當中演化出來的人類關係的本性。你們可能還記得，在三十年前，斯大林宣佈蘇聯已經完全建成社會主義；而且，直到現在，儘管有所謂的非斯大林化和諸多斯大林神話的破壞，這一點仍然是蘇聯官方理念的中心教義。此外，斯大林的繼承人堅持，蘇聯現在正忙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或者，它正在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那個高級階段，也就是要完成十月革命所開啓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言人對於他們的國家也做過類似的主張。現在，有關蘇聯社會主義成就的斯大林獨斷見解，已經嚴重影響並改變了一般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流行的印象，甚至改變了相當的一些社會主義學者的想法。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而且應該是馬上就明白顯露的：不管是在斯大林或是在他的繼承人的統治之下，蘇聯社會的典型的人，與馬克思主義觀念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

存在著如此令人震驚的對比，以致於我們若不是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就必須像斯大林主義思想學派所默默在做的那樣，把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棄置於水中。這不是針對福音字義的小爭論，而是對我們來說最具理論和實踐重要性的專題。如果我們的目標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則我們對他的概念或印象，對於我們的理論思維，對於勞工運動的道德——政治環境，對於我們自己是否有鼓動工人階級的能力，都是極重要的。

現在，馬克思和到斯大林為止的跟從者，都把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設想成即使在所謂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中，也能在一個合理地加以計劃的經濟中工作的、自由聯合的生產者，不再是在市場中從事買賣的買方或賣方，而是一些幫整個社會製造產品，並從社會的公共貯藏所取用產品作為個人消費用途的某些個人。根據定義，就算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住在無階級和無國家的社會中，並免於社會或政治壓迫，然而，即使在一開始，他仍得帶著遺傳下來的社會不平等的重擔，一種會穩定遞減的重擔。他所生活的社會，必須是如此地高度發展，如此地富有、有教養而又開化，而且，它沒有任何客觀需要或必要去允許不平等和壓制的復發。

這是斯大林之前的一切馬克思主義者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這是曾經鼓舞數代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如果沒有這一點，社會主義不會成為本世紀的能動力量降臨人間。馬克思主義已經用下列的事實來描述這個理想的現實特性：現代社會的整體發展，在它的科技、工業和日益增加的社會化生產過程的伴隨之下，正導引向這個結果。現在，斯大林及其繼承者所呈現在這個世界面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只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形象的一種拙劣仿造品。不錯，蘇聯人生活在一個不是由資本家，而是由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而這個環境也已經在他們的心態上反映出一定的進

步特徵。即使蘇聯工人當中最落後的部份，也把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對他來說，工廠或煤礦的私人所有制，已經成為過去某個野蠻時代的遺物。他只要一想到便會發抖。正如同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般成員對奴隸制的看法一樣地，他也把私有制當作一種對人類而言是可恥的社會條件。但是，儘管如此，雖然蘇聯人有其進步的特徵，這些蘇聯人外觀上的進步特徵，並不是他的社會心理的支配性特徵。

蘇聯社會已經，並且仍然正在承受物質匱乏的痛苦，首先是消費品的極端不足，這在數十年來導致無可避免的社會不平等的復發和惡化，導致一個特權少數與被剝奪多數的深刻分裂，導致市場經濟力量的自發性再現，並且導致國家之壓制機能的復辟和驚人的成長。

斯大林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是飢餓的、穿破爛衣服的、住破老房子的，甚或赤足的工人或農民，他們在黑市或灰市⁶⁸，買賣一件襯衣、一件家俱、幾盎司肉甚或一塊麵包，他們在兵營那樣的工廠紀律下，每天工作十或十二小時，而且，有時為了一些實在的或莫須有的指控，須進集中營從事多年的強迫勞動。他不敢批評工廠經理，更不要說上級黨員了。對於影響到他自己和他的國家之命運的任何重要議題，他無權表示任何意見。他被命令，只得去投票；使他的尊嚴和個性受到所謂個人崇拜的嘲弄。這些是事實，目前已被蘇聯的領導者正式地描述出來，也反映在強調有真實性的廣大蘇聯文學著作之中。雖然近幾年來，條件已經大為緩和，貧困、不平等、政治和智識份子的缺乏自由以及官僚的恐怖等，還仍然存在。

我重提所有這些的目的，不在於好辯，而是因為這些條件的主要成因，不只在於統治者的病態意志——雖然它任何時刻都存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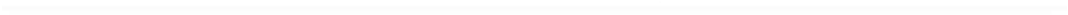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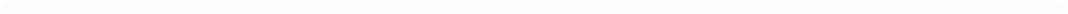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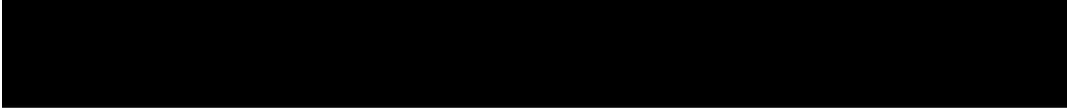
——還在於客觀環境，在於蘇聯（及現在的中國）固有的驚人的貧困，而這些貧困，蘇聯必須在孤立當中，在封鎖情況下要達成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它必須盡其全力於「原始積累」，也就是盡全力在國有制下，創造社會主義的真正建設最重要性的初步措施。因此，即使在今日，蘇聯也還只是一個過渡社會，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給自己尋找某一個方式，把後者的特徵和前者的特徵綜合起來，甚至連更原始的前資本主義傳統的特徵，也表現出來了。不幸地，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越南、北朝鮮以及多數的東歐國家。我們西方人民對那些國家的困境，必須承擔重大的責任——我們在西方沒有推動好社會主義，是他們失敗的最終原因。如果我們重新再面對我們的任務，並且使得一個新世代的社會主義者有可能重新從事戰鬥，我們就必須把過去數十年來已經產生的有關社會主義的錯誤概念和神話，從心的深處全部清洗掉。我們必須永遠和斯大林主義者及後斯大林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拙劣模仿分手，而不是和蘇聯及中國社會主義以及它們的進步成就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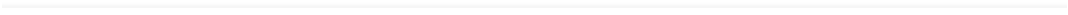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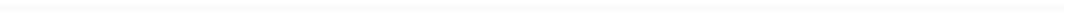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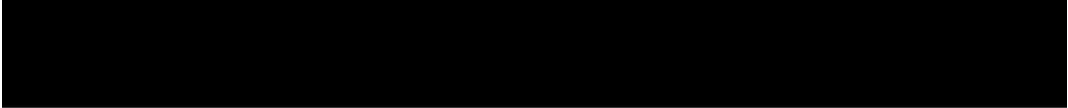
在這裡，我不能夠進一步討論那些導致斯大林和他的夥伴宣稱蘇聯已經達成社會主義，並且仍然使他的繼承人維持這個偽裝的專斷見解和聲望的動機。這裡，我關心的是這個專斷見解或自跨已經對西方的社會主義造成的衝擊。這個衝擊已經造成重大的傷害。它已經使我們的勞工運動沮喪失志，並且混淆了社會主義思想。我們的工人階級對於蘇聯的發展，已經用他們自己精明的方法加以考察，並且獲得他們自己的結論。事實上，他們說了：「如果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理想典範，那我寧可與它無關。」我們社會主義智識份子當中，有很多人已經有類似的反應。要不便是糾纏於斯大林主義神話與經院哲學而失去社會主義信念的銳氣和力量，並且解除他們自己的精神武器，以致於不能和工人階級當中的幻滅和冷

淡作抗爭。

曾經有人這樣說到耶穌會會員，他們不能把地球提到天堂，便在天堂往下挖，挖到地球。同樣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沒有辦法把因貧困侵襲而悲慘的俄國栽培出社會主義，便把社會主義往下拉，拉到俄國的悲慘水平。可以辯稱說他們必須這麼辦。即使真是如此，我們也必須另做他事：我們必須把社會主義栽培到它自己可能達成的高度。我們必須向我們的工人階級和智識份子解釋，爲什麼蘇聯和中國一直沒有夠製造——過去沒有能夠製造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儘管他們有令人注目的成就，使得他們有權和取得我們的承認和團結。我們仍必須讓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形象恢復它精神上的光彩。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心靈中，首先恢復起來，然後加強我們的信念，並且在政治上重新武裝起來；我們必須把社會主義意識和社會主義的構想，帶回去給工人階級。

(1987.5.13 譯； 1987.6.4 校)





- ① 本書錄自伊薩克·羅伊徹著《馬克思主義，戰爭與革命——四十年文集》一書的最後一部份，即第五部份。前四部份依次為：《蘇聯》，《冷戰》，《歐洲》，《中共》。P.安德森為該書所作之序，此處僅收錄有關第五部份之評價，作為本書的序。——（譯註）
- ② 法老（Pharaohs）：古埃及國王的稱呼。約始於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譯註）
- ③ 波旁王朝（Bourbons）：歐洲最著名的王室。法國王路易八世之孫波旁公爵路易一世的後裔。波旁家族在法國（1589-1792, 1814-1815, 1815-1830）、西班牙和拿不勒斯等國先後建立王朝。——（譯註）
- ④ 維多利亞（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英國女皇（1837-1901）。在位期間，英國擴大對殖民地的掠奪，一度取得世界貿易和工業的壟斷地位，英國史家把這段期間稱為「黃金時代」。——（譯註）
- ⑤ 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767-1849）：美國總統（1828-1836），民主黨人。他進行過某些民主改革，但又把「分贖制度」——即由大選中獲勝的黨人把持國家的職位——帶進政治生活。——（譯註）
- ⑥ 法國第二帝國（Second Empire in France）：法國歷史上第二個波拿巴主義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國家。1856年12月，路易·波拿巴宣佈成立。1870年普法戰爭時被法國九月革命所推翻。——（譯註）
- ⑦ 容克（junkers）：普魯士的貴族地主階級。十六世紀起，長期壟斷軍政職位，掌握國家領導權。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資本主義化，成為半封建型的貴族地主。它是普魯士和德意志各邦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聯合後，右翼勢力的支柱。——（譯註）
- ⑧ 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1871年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建立的工人政權，從3月28日宣佈成立公社到5月28日被凡爾賽份子擊敗，是馬克思所津津樂道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譯註）
- ⑨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俄國政治家。在1905年俄國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頗有名聲。主張「不斷革命」。因反對斯大林，於1929年被驅逐出境，乃成立第四國際。後被斯大林手下暗殺於墨西哥。——（譯註）
- ⑩ 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和理論家。190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曾反對列寧的民族自決論（1915）、布列斯特條約的訂定（1918）。後因反對斯大林被處死。——（譯註）
- ⑪ 季諾維也夫（Grigori Evseyevich Zinoviev, 1883-1936）：俄國共產黨領導人。1903年和列寧一起建立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前擔任黨的中央委

- 員。革命後，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及共產國際主席等職。後組「新反對派」（1925）並與托洛茨基聯合（1926）反對斯大林，被處死。——（譯註）
- ⑫ 盧森堡·羅莎（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生於波蘭。1893年參加創立波蘭社會民主黨。1897年移居德國，積極參加德國工人運動。曾經反對列寧的民族自決權主張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1918年，投身於十一月革命運動，堅決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叛變，並從事德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後與李卜克內西一物被艾伯特反動政府殺害。——（譯註）
- ⑬ 拜物教（fetishism）：原始人由於對自然現象缺乏理解，以為許多物體（如石頭、樹木、弓箭等）是有靈性的，對它們加以膜拜以求得嘉惠或保庇。拜物教一詞，也用來比喻對某種事物的迷信，如國家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等。——（譯註）
- ⑭ 維伯夫婦（Sidney James Webb, 1859-1947; Beatrice Webb, 1858-1943）：維伯是英國社會改革家和經濟史家，費邊社會主義的倡導人之一。倫敦大學教授、國會議員，兩度任工黨內閣大臣。曾廣泛研究英國勞工問題，被稱為工聯主義理論家。主張用漸進的方式，實行社會改革，實現土地和產業資本國有或市有。維伯夫人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著作家。——（譯註）
- ⑮ 韋伯·馬克思（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曾任教於夫來堡、海德堡、和慕尼黑等三家大學，主要興趣在於社會史。後來逐漸以比較社會史的經驗科學方式來處理社會學。他還對社會學的下列內容作過研究：領導、國家、經濟、法學、音樂、和宗教。他的加爾文主義與基督教理論，成為學界不斷爭論的課題。——（譯註）
- ⑯ 漢斯·H·格特及C·賴特·米爾斯（Hans H. Gerth C. Wright Mills）編譯：《來自馬克思·韋伯：社會學論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牛津，1953年，第214-15頁。——（原註）
- ⑰ 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德國主要的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派。十九世紀中葉適應較落後的德國產業資本的發展而發生。先驅者為彌勒和吉斯特。主要代表，先有羅雪爾、希爾德布蘭德和克尼斯，稱為歷史學派；繼有施穆勒、瓦格納和布倫坦諾等，稱為新歷史學派。他們採取歷史方法，著重個別歷史事實的敘述，而忽略理論的分析；不從生產關係的本質、而從外在的現象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譯註）

- ⑮ 蒲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譯註)
- ⑯ 巴枯寧 (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俄國無政府主義者。1864年加入第一國際，極力鼓吹無政府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譯註)
- ⑰ 克魯泡特金 (Pyotr Aleks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俄國地理學家、社會哲學家、和無政府主義革命家。一度參加過第一國際，後來和巴枯寧退出。他主張消滅私有制、廢除一切國家，建立「無政府」社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譯註)
- ⑱ 羅伯斯比爾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1758-1794)：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雅各賓派政府的實際首腦。1793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起義後，領導政府，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定吉倫特派的反革命叛亂，粉碎歐洲君主國的武裝干涉。後遭政變，並被處死。——(譯註)
- ⑳ 丹東 (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1794)：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活動家。曾加入雅各賓俱樂部。雅各賓專政時期，他公開反對政府的恐怖政策和普遍限價政策，力主對反革命份子「寬容」。後被處死。——(譯註)
- ㉑ 雅各賓派 (Jacobins)：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最大的政治派別，是雅各賓俱樂部 (或憲政之友社) 成員在自由貴族和大工商資產階級退出並建立斐揚派和吉倫特派後的民主派。——(譯註)
- ㉒ 阿貝爾派 (Hébertists)：以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雅各·勒奈·阿貝爾 (Jacques René Hébert, 1757-1794) 為中心的派別。1794年3月密謀起事反對羅伯斯比爾政府，失敗後，阿貝爾被處死。——(譯註)
- ㉓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16頁。——(譯註)
- ㉔ 上引書第167-168頁。——(譯註)
- ㉕ 上引書第168頁。——(原註)
- ㉖ 創世者 (Demiurge)：創造世界者；次於最高神的造物者。——(譯註)
- ㉗ 無套褲漢 (sans-culottes)：1789年法國革命時用來指法國的低下階級——店員、工匠和工人。是穿套褲的貴族輕視穿長褲勞動的人的用語。——(譯註)
- ㉘ 托克威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他對美國民主和法國革命的研究，對十九世紀社會科學提供了創新及

影響性的書籍。——（譯註）

- ① 亞歷克西斯·德·托克威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舊政權與法國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紐約，1955年，第32-41頁。——（原註）
- ② 王政復辟（the Restoration）：從1815年拿破崙被迫第二次退位到1830年七月革命的時期，是法國波旁王朝復辟的時期。——（譯註）
- ③ 市民國王（Citizen King）：1830年七月革命後，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浦被擁立為法國國王，代表資產階級執政，稱為市民國王。——（譯註）
- ④ 波拿巴（Bonaparte）：指拿破崙一世（拿破崙·波拿巴）和拿破崙三世（路易·波拿巴）。前者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百日王朝（1804-1814, 1815）；後者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1870）——（譯註）
- ⑤ 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 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領袖之一。——（譯註）
- ⑥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論第二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20頁。——（原註）
- ⑦ 上引書第322頁。——（原註）
- ⑧ 作者是在1960年發表本文的，到現在（1988年）已超過一百年了。——（譯註）
- ⑨ 上引書第320頁。——（原註）
- ⑩ 布爾什維克（Bolshevik）：原意是多數派。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制訂黨綱、黨章時，以列寧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同馬爾托夫等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投票選舉中央機關時，前者獲得了多數票，稱布爾什維克。此後，布爾什維克即成為列寧主義者的稱號。——（譯註）
- ⑪ 卡爾·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2頁。——（原註）
- ⑫ 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盎格魯和撒克遜原係古代日耳曼人當中的兩個部落集團。公元五至六世紀，各有相當多的人口移居大不列顛島；到七至十世紀間結合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征服並同化島上土著克爾特人，並與後到的丹麥人和諾曼人結合，逐漸形成近代英吉利民族。「盎格魯-撒克遜人」一詞，近代常被用來泛指英吉利人、蘇格蘭人以及他們在北美、澳大利亞、南非等地的移民。——（譯註）
- ⑬ 作者是在1965年發表本文的，對現在（1988年）來說，他的成年已經是六十多年的事了。——（譯註）

- ④ 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西歐中世紀主要哲學思想的總稱。是產生於天主教的學院，故稱經院哲學。主張理性服從信仰，哲學是「神學的婢女」，目的在於論證基督教的教條，維護教會和封建的統治。最主要的代表是托馬斯·阿奎那。——(譯註)
- ⑤ 普列漢諾夫 (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後來成為孟什維克的領袖之一。——(譯註)
- ⑥ 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劍橋學派的創始人。——(譯註)
- ⑦ 李嘉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國傑出的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在經濟理論上，制定了資產階級眼界內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勞動價值論；並以此為基礎，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利益的衝突，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譯註)
- ⑧ 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者。他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和價值的尺度，是一大功績。——(譯註)
- ⑨ 斯達漢諾夫主義 (Stakhanovism)：蘇聯工人利潤刺激制度，是礦工 Alexei Stakhanov 於 1905 年所設計出來的。——(原註)
- ⑩ 一國社會主義 (socialism in a country)：斯大林於 1924 年 12 月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外首先提出的理論。他認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社會主義有可能在一國範圍內勝利完成。這種提法是托洛茨基所一向反對的。——(譯註)
- ⑪ 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凱因斯主義的創始人。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危機後提出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有需求不足的理論，鼓吹國家全面調節經濟生活，以挽救資本主義。——(譯註)
- ⑫ 卡珊德拉 (Cassandra)：古希臘傳說中特洛伊王普萊姆 (Priam) 的女兒。阿波羅神愛她而賜給她預言的能力。——(譯註)
- ⑬ 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 1821-1881)：俄國小說家，空想社會主義者。——(譯註)
- ⑭ 戈培爾 (Joseph Paul Goebbels, 1897-1945)：納粹德國戰犯。1928 年起掌管國社黨的宣傳機構。1933 年希特勒上台後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一貫鼓吹戰爭，宣傳種族主義。蘇軍佔領柏林時自殺。——(譯註)

- ⑤⑤ 克倫斯基 (Alexander Feodorovich Kerensky, 1881-1970) : 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總理 (1917 年), 蘇維埃政權的死敵。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執政期間, 代表資產階級、地主利益, 對內鎮壓革命運動, 對外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後進行武裝叛變, 後逃巴黎, 並轉到英國。——(譯註)
- ⑤⑥ 波吉亞家族 (Borgias) : 指羅德里戈·波吉亞 (Rodrigo Borgia) 和他私通女人所生的女子。羅德里戈於 1492 年賄選上教皇。他提拔兒子塞扎 (Cesave, 1475-1507) 為樞機主教, 後者過著放蕩生活。為了政治上的利益, 他把女兒盧克麗霞 (Lucrezia, 1480-1519) 在二十二歲以前兩度訂(婚)給西班牙貴族, 三度嫁給義大利王子。波吉亞家族是文藝復興最狡猾無恥敗德的男女代表。——(譯註)
- ⑤⑦ 丹尼爾和辛雅夫斯基之審 (the trials of Daniel and Sinyavsky) : 丹尼爾 (Yuli Daniel) 和辛雅夫斯基 (Andrei Sinyavsky)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的著名小說家, 曾試採「幻影的現實主義」(phantasmagoric realism) 散文體。因涉嫌毀謗蘇聯而受審。——(譯註)
- ⑤⑧ 聖西門 (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 :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設想各種社會改革方案, 要建立一個人人勞動的社會。他主張社會改造的責任應當由「最有教育」的企業主、銀行家、商人來擔當, 由他們掌握政權。他不主張消滅私有制, 反對暴力革命, 幻想通過教育以及道德、科學的進步, 實現他的理想社會。——(譯註)
- ⑤⑨ 傅利葉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設想理想的社會單位法郎吉, 作為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單位。幻想不廢除私有制, 通過宣傳和教育來實現社會主義。——(譯註)
- ⑥⑩ 寂靜主義 (quietism) : 使基督信仰進入一種不受干擾的聖靈冥思完美狀態, 保持自己如靈魂寂靜, 並處於聖靈所影響下的完全被動狀態, 既不注意平常的宗教箴言, 也不介意是否得嘉償或受處罰。在此轉訓為被動順天命。——(譯註)
- ⑥⑪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倫敦, 1963 年, 第 49-50 頁。——(原註)
- ⑥⑫ 費爾巴哈派 (Feuerbachian) : 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 的思想派系。主張無神論、人本主義。拋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辯證法。——(譯註)
- ⑥⑬ 梅林 (Franz Mehring, 1846-1919) : 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活動家、政論

家和歷史學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及考茨基等人從事理論鬥爭。——（譯註）

- ⑥4 作者是在 1967 年發表本文的，到現在（1988 年）應為六十年前。——（譯註）
- ⑥5 昇華（sublimation）：將性衝動或其它動物本能之衝動提昇轉化為有建設性或創造性行為的過程。——（譯註）
- ⑥6 上引書第 50 頁。——（譯註）
- ⑥7 上引書第 51 頁。——（譯註）
- ⑥8 灰市（gray market）：還沒有達到犯法程度的私有貨物的秘密買賣；用「灰市」，所以有別於「黑市」。——（譯註）

新學問叢書 1
再 版

谷凡之 · 著

東方專制主義論

二〇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支配了東方社會，可是，馬克思却最不理解東方社會。解嚴後，大家的視野勢必擴大，也將浮現許多質疑：

為什麼共產革命常常淪為專制政權？

為什麼東方社會的本質會引發世界性的大辯論？

為什麼這種辯論又成為蘇聯和中共黨爭的焦點？

《東方專制主義論》告訴你根本的癥結！

八〇年代後期的你，不能逃避這個歷史性的大辯論。

定價 / 180元

新學問叢書 3
再 版

M. Bookchin · 著

生態學與革命思潮 (POST-SCARCITY ANARCHISM)

六〇年代的革命狂熱，震撼了盲目追求成長的資本主義世界。所有的神話在反抗浪潮中逐漸崩解：科技的濫用、自由的假象、神聖化的教條主義……開始面臨普遍而深烈的質疑。

生態學的崛起，正意味著這股重新反省的思潮。生命科技的重建、自由的真諦、解放的極限……在本書中都提出新新的澄清。

定價 / 90元

新學問叢書 4
再 版

佛洛姆 · 著

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 Marx's Concept Of Man

“馬克思的哲學是一種抗議，這種抗議充滿了對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夠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潛在才能得到實現。”

佛洛姆 (Erich Fromm) 依循這個理念，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尋到了人本主義的源頭，重新釐清後世對馬克思思想的曲解與誤用。這是一本經典之作，欲瞭解馬克思對於人的概念，不可不讀。

定價 / 90元

新學問叢書 5

胡塞爾●著
倪梁康■譯

現象學觀念

——胡塞爾講稿

對胡塞爾而言，哲學是徹底確定性之追尋。是要在經驗中找到像數學般所具有的那種必然性，不過，這種必然性是現實人生中的一種功能，而不是設理方法中的公設和定義的那種功能。除了現實世界所擁有的必然性之外，胡塞爾追尋的是在經驗底下而使經驗成爲可能根基。本書的論證越過笛卡爾和康德的體系；而直入人類心靈的深層。想受了解近代學術的一大根源，勢必通過本書的考驗。

定價 / 90元

新學問叢書 6

H·馬庫色●著
梁啟平■譯

反革命與反叛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本書是馬庫色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總批判。著者認爲，在世界性的反叛運動中，不但反對資本主義的理性，甚至也過激地反對了理性本身。正由於這些行爲已和現實異化之故，則反叛運動就必然是“象牙塔式”的，是受到群眾敵視的。即使如此，馬庫色仍然堅持新左派不僅使統治集團深感頭痛，而且將始終是最進步的反对力量。自始至終，他的希望也還是寄托在年輕的激進左派身上。

本書在六〇年代的校園中幾乎人手一冊，對八〇年代的台灣亦必是最具啓發性的經典小書之一。

定價 / 90元

新學問叢書 7

魯凡之●著

中國社會主義論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像中國一樣地長期經歷過急劇和反覆的變化。可是佔有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將走上怎麼樣的道路，將建立怎麼樣的國家，却關係著整個世界的演變。台灣的前途、台灣人民的命運，更和中國的變向有著萬籟般不可切割的關係。因此若要觀測台灣的未來，就一定要虛心地認識中國。本書從中國文化原型著手剖解，逐漸揭開神秘中國的面紗，並以宏觀的巨視角度對中國提出最具體的建設處方。

定價 / 220元

新學問叢書 8

I·羅伊薩·著
洪 楚■譯

馬克思主義與當代
(Marxism and Our Time)

本書在當代社會主義理論中之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在於作者大膽提出了六〇年代以後，左派運動者都必須勇敢面對的四個問題：1. 官僚政治；2. 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先進國家的關係；3. 暴力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4. 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文明？

作者不僅對真理和力量做了冷靜而有益的論述，也提供了更清楚的人類未來展望。是認識當代新馬克思思想最便捷的典範著作。

定價 / 90元

台灣文史叢書 1

再 版

吳濁流日文遺著
鍾 肇 政■譯

台灣連翹

台灣連翹乃是一種常綠植物，花呈紫色，果實橘黃，據鍾肇政先生解釋，台灣連翹通常被用來種植於屋前充當籬笆(俗稱活籬)，為了求其美觀外狀，「屋主人」常要將之整修得方方正正，偶有不聽話或不甘屈服的枝葉，竟妄想冒出頭來的話，「作孽」，一定要被剪掉，是否這即是台灣人無可擺脫的「悲運」？

定 價 / 150 元

台灣文史叢書 2

呂 昱●著

獄中日記

白色恐怖的冰山，在解嚴後正日漸溶解，所有在監獄中冷過的族類，都有責任將他成冰的歷程為漸暖的塵世做一交代，也為後代子孫留下禦寒的技巧。就歷史的眼光而言，第一手血淚的資料才是硬撻制子手最佳的利器，因為冰凍的證言才經得起人世的風霜，那怕有些沙啞和低調，總是初春的號角，你得側耳：

迎著這一層霧，
還誰來聽我訴，
說一個没人信的故事，
問一句沒答案的題目。

.....

定價 / 190元

新社會叢書 1

邁克爾·沙勒●著
郭濟祖■譯

美利堅在中國

在中國內戰期間，國民黨的保守份子為什麼要向美國求助？何以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持有偏見？又為什麼美國各派系的力疊會捲入國共兩黨的權力鬥爭之中而不可自拔？……太多迄今仍無法公開的真相和答案，本書作者大膽做了最詳細真實的分析和揭露，是中國現代史最重要的研究著作。

定價 / 240元

新社會叢書 2

馬庫色●編著
任立■譯

當代社會的攻擊性 —新左派論工業社會

工業文明創造了當代的“富裕社會”，却也不可避免地因其內具的攻擊性，而造成人類的沉重負擔和緊張關係。新左派的理論大師曾針對此一迫切課題深入研究，並分別提出人類適應之道，本書所選各篇論文即是其中最具份量者，是當代人切入當代社會本質的經典著作。

定價 / 90元

新社會叢書 3

L·托洛斯基●著
簡文宜■譯

被背叛的革命

本書作者托洛斯基是領導十月革命創建蘇維埃新政權的革命家，然而，當斯大林掌權後，托氏却遭到放逐命運。本書即係托氏於流亡期間反省蘇聯的變局及瞻望其前途的最偉大著作之一，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乃至家庭等方面，作者均能平心靜氣地將蘇聯的神秘面目呈現於世人之前，對於向來引頸翹首於西方歷史的台灣讀者更應能填補長期對蘇聯和共產世界模糊認知上的空白。

定價 / 160元

新社會叢書 1

邁克爾·沙勒●著
郭濟祖■譯

美利堅在中國

在中國內戰期間，國民黨的保守份子為什麼要向美國求助？何以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持有偏見？又為什麼美國各派系的力暈會捲入國共兩黨的權力鬥爭之中而不可自拔？…太多迄今仍無法公開的真相和答案，本書作者大膽做了最詳細真實的分析和揭露，是中國現代史最重要的研究著作。

定價 / 240元

新社會叢書 2

馬庫色●編著
任立■譯當代社會的攻擊性
—新左派論工業社會

工業文明創造了當代的“富裕社會”，却也不可避免地因其內具的攻擊性，而造成人類的沉重負擔和緊張關係。新左派的理論大師曾針對此一迫切課題深入研究，並分別提出人類適應之道，本書所選各篇論文即是其中最具有份量者，是當代人切入當代社會本質的經典著作。

定價 / 90元

新社會叢書 3

L·托洛斯基●著
簡文宜■譯

被背叛的革命

本書作者托洛斯基是領導十月革命創建蘇維埃新政權的革命家，然而，當斯大林掌權後，托氏却遭到放逐命運。本書即係托氏於流亡期間反省蘇聯的變局及瞻望其前途的嚴肅大著作之一，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乃至家庭等方面，作者均能平心靜氣地將蘇聯的神秘面目呈現於世人之前，對於向來引頸翹首於西方歷史的台灣讀者更應能填充長期對蘇聯和共產世界模糊認知上的空白。

定價 / 160元

新社會叢書 1

邁克爾·沙勒●著
郭濟祖■譯

美利堅在中國

在中國內戰期間，國民黨的保守份子為什麼要向美國求助？何以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持有偏見？又為什麼美國各派系的力量會捲入國共兩黨的權力鬥爭之中而不可自拔？…太多迄今仍無法公開的真相和答案，本書作者大膽做了最詳細真實的分析和揭露，是中國現代史最重要的研究著作。

定價 / 240元

新社會叢書 2

馬庫色●編著
任立■譯當代社會的攻擊性
—新左派論工業社會

工業文明創造了當代的“富裕社會”，却也不可避免地因其內具的攻擊性，而造成人類的沉重負擔和緊張關係。新左派的理論大師曾針對此一迫切課題深入研究，並分別提出人類適應之道，本書所選各篇論文即是其中最具份量者，是當代人切入當代社會本質的經典著作。

定價 / 90元

新社會叢書 3

L·托洛斯基●著
簡文宜■譯

被背叛的革命

本書作者托洛斯基是領導十月革命創建蘇維埃新政權的革命家，然而，當斯大林掌權後，托氏却遭到放逐命運。本書即係托氏於流亡期間反省蘇聯的變局及瞻望其前途的最偉大著作之一，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乃至家庭等方面，作者均能平心靜氣地將蘇聯的神秘面目呈現於世人之前，對於向來引領魁首於西方歷史的台灣讀者則更能填補長期對蘇聯和共產世界模糊認知上的空白。

定價 / 160元

新藝文叢書 1
再 版

馬庫色·著
陳昭瑛·譯

美學的面向 ——藝術與革命

人類普遍性的意義，如何經由特殊的人和物表現出來，一直是藝術思想關注的主題之一，尤其是近代解放運動層層展開之際，藝術的庸俗化、大眾化正和藝術的孤絕化相對峙，使得廣大的心靈流轉於兩極之間，馬庫色的辨證美學一面堅持革命的理念，一面承續傳統的美學價值，為此時代的焦慮，點燃熔合的火把。

定價 / 150元

新藝文叢書 2
再 版

T. Eagleton (伊格頓) · 著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

當代的文學批評主流中，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一直居於中流砥柱的地位，本書由英國文學理論巨擘 Terry Eagleton 執筆，深入淺出地討論了當代西方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現狀。這是一本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的經典之作。

定價 / 90元

新藝文叢書 3

E. 巴爾等 · 著
張伯霖等 · 譯

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 ——盧卡契研究

盧卡契雖是一位社會運動家，其學術貢獻卻能跨越許多領域，如美學、文學批評、哲學、社會學和政治等都有他精警的見解。就美學而言，他從反現代主義的立場出發，發展出一套馬克思主義的寫實主義，並以此辯證他向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挑戰。就社會學而言，他的「階級意識」理論，深深地影響了「知識社會學」、「法蘭克福學派」和晚近的各種社會學理論。本書詳盡地介紹盧卡契的生平和思想，並將這樣一位傳奇性人物溶入歷史的潮流中，欲想深入了解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的人，實在不可不讀。

定價 / 110元

新藝文叢書 4

G·盧卡契 ● 著

黃大峰等 ■ 譯

托爾斯泰論

托爾斯泰的美學的基本路線有一種藝術方向，那就是傾向於通俗；傾向於處理那些生活中具深刻性和普遍性而能夠為大家所了解的重大問題；傾向於那種使荷馬史詩或已經為大家都容易領會的古老的清晰易懂的藝術形式。托爾斯泰在從事關於一種沒有寄生蟲的未來社會的烏托邦夢想的時候，預想到一種為任何一個工人都能學會的未來藝術。由於這個緣故，在藝術形式的本質方面，那種藝術一定會勝過現代藝術家那種錯綜複雜的技巧和不恰當的雕琢。

——G·盧卡契

定價 / 110元

新藝文叢書 12

李尚仁 ■ 編譯

邁向第三電影

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第三世界各國陸續出現澎湃洶湧的電影運動，在他們的電影中，呈現出強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和獨特的美學，對政治、社會、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提出尖銳、深刻的批判。本書收集了「邁向第三電影」、「支持不完美電影」、「饑餓的美學」……等最重要的第三世界電影宣言，是國內對第三世界電影第一本完整的第一手資料介紹。

定價 / 140元



南方

出版者 / 南方叢書出版社

劃撥 / 1159975-7

地址 / 台北市景美區興隆路二段 196 號 8F 之 1

電話 / (02)9343174 · 9343732 · 9312662

- 各類叢書郵撥九折。
 - 南方雜誌訂戶一律八折優待。
 - 學生個人、團體一次訂購十本以上者，另有優待辦法。
- 請洽發行部9312662顏小姐。